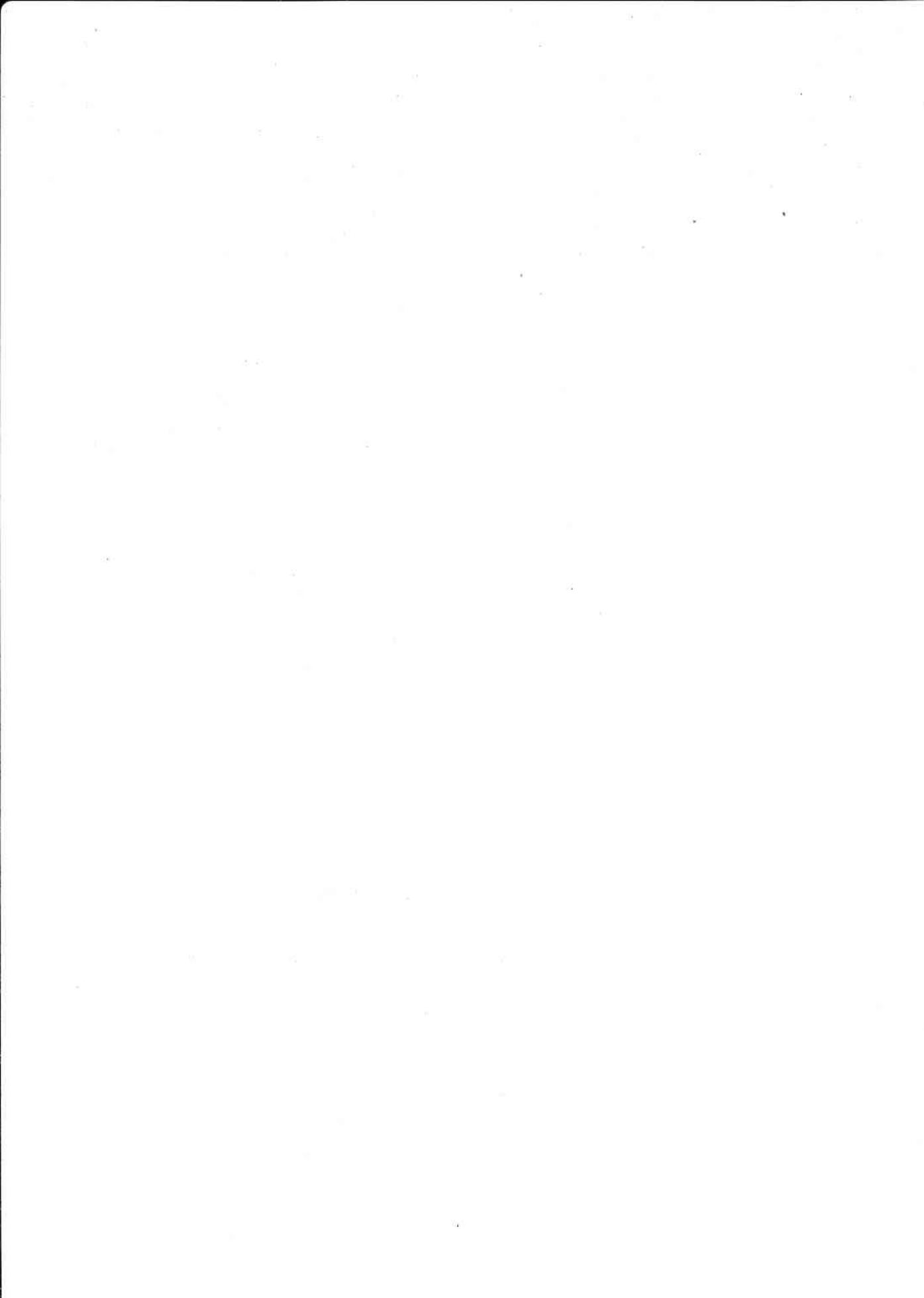


# 学习 与 批判



1976

柳青  
一九七六年



#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六年第九期 目 录

###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从我县农业生产的规律性看唯生产力论的破产

..... 中国共产党上海县委员会 (3)

#### 怎样看待形势？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方海 (7)

“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 宫效闻 (10)

工人参加管理就是好..... 中华造船厂党委中心学习组 (14)

团结批邓在一起..... 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一车间 王炳英 (17)

杂说“官”..... 戚承楼 (18)

文“摘句”与“拳术”..... 包斯文 蒋桐发 (20)

批邓不停 生产跃进..... 中共上海跃进电机厂总支委员会 (21)

### 抗震救灾 人定胜天

山崩地裂 视若等闲 ..... 忻启明 (25)

“干部最后走” ..... 潘益大 (28)

干部的岗位在哪里?..... 龚青 (29)

### 地转实为新地兆

——读洪秀全的《地震诏》..... 韩天宇 陈宗海 (30)

## 经济问题研究

### 光明灿烂的希望

——上海郊区社队工业调查札记

..... 市革委会郊区组工业组 王信荣 王魁元 (32)  
市革委会工交组生产组 俞树泰 王曙光

### 充分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

——谈谈支持社队工业的一点体会

..... 中共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委员会书记 朱庆隆 (38)

### 采购人员说潜力

——记上海化学试剂站采购员李定安的一次谈话 ..... (40)

记一次发言 ..... (41)

关于问题茶盘生产论 充分认识吨位挂帅的危害性

..... 上运三场党委书记 顾美修 (43)

从开展刀具修磨业务看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

..... 上海工具厂刀具修磨服务部 (45)

## 纪念鲁迅 学习鲁迅

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 ..... 石一歌 (47)

### “怒向刀丛觅小诗”

——论鲁迅后期诗歌的战斗性 ..... 任 犊 (50)

读《理水》 .....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海 钟 (55)

##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 亲家,还是冤家?

——评苏修短篇小说《父亲》 ..... 薛 毅 (56)

附: 父亲 ..... (59)

杂文: 当代最大的“米蛀虫” ..... 楼乘震 吴安泰 (64)

## 社会调查

金竹婚礼 ..... 陆晓禾 周勇闯 宣玲玲 (66)

九月六日付印  
九月十四日出版

#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从我县农业生产的规律性 看唯生产力论的破产

中国共产党上海县委员会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大肆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最近的一系列指示，对本县解放以来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更加看清了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

《论总纲》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恶毒诬蔑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胡说这是“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其实，割裂和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正是邓小平这一伙修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分析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教导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深入地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上海县二十几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就完全证实了革命导师所指出的真理。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增长了两倍半，棉花平均亩产增长了五倍，油料、蔬菜、生猪的产量也都成倍或几倍地增加。现在一个上海县的粮、棉、油、菜、猪的总产量，已经等于解放初三、四个上海县了。广大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也大大提高，除了家庭副业的收入以外，现在按人口

分配的年收入平均都在一百八十元左右，就是说一个人的收入等于解放初期四、五个人收入的总和。

我们县农业生产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回顾这一段走过来的道路，农业生产能不能搞上去，它的发展速度的快慢，总是由阶级斗争的状况，以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状况所决定的。凡是生产发展的步子跨得很大的时候，都是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使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之后。下面，我们通过粮食生产的情况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一条规律。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我县经过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贫下中农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亩产从一九四九年的四百五十八斤猛增到一九五一年的七百三十三斤，增长百分之八十。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开展，在国家帮助下，生产有所发展。但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生产很不稳定，出现了两极分化。这几年中，一九五三年产量较高，是由于开展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调动了群众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结果。一九五四年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反对合作化，砍“自发社”，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产量就又下降了。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现了合作化，使生产资料从小私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建立了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组织起来力量大，一九五六年粮食亩产达到八百二十一斤。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资产阶级的策应下向党进攻，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也刮起了一股退社的“小台风”，生产就又掉了下来。

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大跃进。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一九五七年冬一九五八年春开始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大兴农田水利的群众运动，接着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照耀下，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诞生了，使原来的集体所有制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生产力进一步解放。这一年粮食亩产猛跳到九百五十一斤。而往后的几年，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减产，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的粮食亩产都在八百五十斤左右。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武装了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从一九六三年开始进行了四清运动，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煞住了刘少奇、邓小平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巩固了集体经济，使生产大幅度上升，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从上年的八百六十二斤

一跃而达一千一百〇二斤，我县第一次成了千斤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县同全国一样，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和壮大，农业生产也就更迅速地向发展。一九六九年的粮食亩产比上年猛增了二百斤，一跃而达一千三百九十一斤。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开展，我县的粮食逐年增产，一九七三年超过了一千六百斤，到一九七五年已连续三年实现亩产翻“纲要”。

正如列宁深刻地指出的：“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不断发展，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倾向，总是只能给生产造成极大的障碍和破坏。如果按照邓小平在《论总纲》中提出的那一套去搞，我们工农业生产必然要掉下来，我们二十多年奋斗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论总纲》还诬蔑我们认为“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这完全是信口开河。许多年来，我县广大干部和社员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真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他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懂个屁！那些生产发展步子跨得比较大的几年，正是由于我们抓住了生产技术上的主要环节，且有较大的突破才实现的。合作化前几年的生产增长，就是逐步扩大稻麦两熟制，推广“老来青”水稻良种和“小株密植”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五八年大增产，如果没有大兴农田水利、大积自然肥料的运动和逐步增加机电灌溉的面积，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用“农垦 58”水稻新良种普遍代替了逐渐退化的“老来青”，是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生产技术上的关键。文化大革命以来生产不断增长，连续三年实现亩产翻“纲要”，在生产技术上，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个是全面地改革了耕作制度，实现了三熟制，并且逐步提高了三熟制的栽培管理水平；二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使三熟制在季节上得到保证，并解放出了更多的劳动力用于精耕细作。

然而，我们在生产上花气力，仍然要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生产技术。生产技术是靠人去掌握和实施的，它在任何方面的突破，都离不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就拿推广“老来青”良种和“小株密植”的栽培技术来说，是由于有了互助组才得到了逐步推广，而普遍推广却是在办了合作社、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之后。至于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全面实行三熟制，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体现和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结

果。这些事实恰好说明，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埋头抓生产，是不会抓出什么好结果来的，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

政治统帅经济，革命统帅生产，这是年年如此，永远如此。粮食亩产翻“纲要”之后，我们下一步的指标是超双千斤。但这几年我们感到再要搞上去很吃力。为什么呢？归根到底，是由于前进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比如，要实现粮食亩产二千斤，农田水利设施就不仅要求能适应抗旱、排涝、抗拒自然灾害的需要，而且要求能够满足对水稻进行适时、浅水、勤灌的要求，还要求在遇到不同气候的情况下，有时日灌夜排，有时日排夜灌，做到用水来增温或降温，调节田间小气候，促进或者控制水稻的生长。马桥公社俞塘大队已经连续七年亩产超双千，一九七四年亩产二千四百二十斤，后季稻亩产一季超八百斤，他们就是这样来管水的。还有一些先进单位也大体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普遍地都象俞塘大队那样地管水呢？这里就牵涉到了生产关系上的问题。俞塘大队注意发挥了大队一级所有制的的作用，克服了生产队小集体的局限性，田间排灌由大队统一安排、统一管理。一个机口管四、五百亩地，机器一开，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全大队田里的水灌满或者放干。而我们全县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全县共有三千个抽水机口，一个机口平均管一千多亩地，打遍一次水就要二、三天。所以要普遍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在管水技术上有所突破，就得普遍调整排灌系统才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意解决生产关系中的新矛盾，发挥大队一级所有制的的作用。我县的塘湾公社红星大队有八个生产队，地势南高北低，过去只有一个机口时，近机口的土地受淹了，南边几个生产队还没有打上水，队与队之间常发生争吵。一九七〇年以后，大队发展了工业，资金积累多了，就按地势高低重新规划，由大队统一投资和管理排灌系统，分片建立了四个机口，粮食亩产从一九七四年起就达到了二千斤。至于大搞平整土地，实现土地园田化、水利化，改造土壤，以及进一步提高机械化水平、充分发挥机械使用效率等方面，也都同样遇到类似的矛盾，需要我们加强大队一级和公社一级所有制的力量，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逐步地加以解决。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决心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指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那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深入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上海县尽早建设成为真正的大寨县，使农业生产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快地向前发展。

# 怎样看待形势？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方 海

邓小平指挥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他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篇政治宣言。这篇黑文挥舞“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张开九大“整顿”的天罗地网，大有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口吞掉之势。文章的出发点，就是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

究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形势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空前巩固，还是“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了台”？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欣欣向荣，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发生了危机”？文艺舞台是莺歌燕舞，百花争艳，还是“一花独放”？科技战线是成绩辉煌，还是“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归结到一点，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我国今天，是一轮旭日东升，蒸蒸日上，还是今不如昔，“积重难返”？这就是我们同邓小平一伙之间的原则争论。他们在《论总纲》中，在连篇累牍的文稿、文件、讲话、批示中，顽固地主张和宣传着后一种意见，认为今天是什么都搞乱了、搞糟了。

围绕着形势问题发生的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阶级看形势，必然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特别是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以后，肯定还是否定革命所带来的大好形势，总是反映着究竟是拥护还是反对这场革命的尖锐斗争。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么，你就必然对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空前巩固，感到欢欣鼓舞，形势大好。你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么，你就必然对刘少奇、林彪的覆亡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必然是这也不顺眼，那也不自在，发出绝望的悲鸣。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象绚丽的山花，开遍了祖国大地。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深入开展，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五七道路越走越宽广，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卫生革命硕果累累，千百万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等等。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精神光辉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无产阶级认为好得很，资产阶级必然认为糟得很。邓小平一伙要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以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基本路线，就非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不可。但这样一来，恰恰是暴露了他们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真面目。

邓小平一伙否定大好形势，给无产阶级扣上了“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的帽子，仿佛只有他们才关心经济和生产。果真如此吗？假的。我们讲形势，首先是政治形势，是阶级与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形势。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灿烂的政治革命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试看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战线：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农业到去年已经连续十四年获得了丰收，工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尖端工业部门。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人造卫星返回地面。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已于去年胜利完成。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炮制《论总纲》的先生们，对于这些振奋人心的铁的事实，你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这只能表明，你们用以衡量形势的，并不是你们口头上所宣称的抽象的经济标准、生产标准，而是你们那套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标准。你们讲经济、讲生产，不过是虚伪的借口，是为了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复辟倒退。

光明与黑暗、主流与支流、成绩与缺点，从来就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无产阶级充分强调与重视光明与主流，但也从不讳言光明底下存在着黑暗，主流中间存在着支流；我们的革命工作，就是要通过壮大光明面来战胜黑暗面，通过发展主流来克服支流。而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阶级，他们只有过去，没有未来。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对待革命问题上必然是悲观主义者、失败主义者。他们不可能向前看，而总是要向后看。他们总是过低估计了革命的力量，过高估计了反动的腐朽的力量。他们总是要夸大黑暗面以否定光明面，夸大支流以否定主流，夸大缺点以否定成绩。抓住一些个别问题和表面现象，任意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借以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便是邓小平一伙和一切反动派否定革命大好形势所惯用的手法。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到无产阶级的叛徒，又有哪一天不在宣称我们的革命事业面临着“垮台”的“危机”呢？资产阶级右派不是曾经对形势作出了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下台的估计吗？刘少奇不是曾经宣布我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吗？林彪不也曾断言我国“政局不稳”、“危机四伏”

吗？但是历史无情地嘲弄并惩罚了他们。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是通向机会主义的桥梁。反动派对于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不过是他们反动本性的顽强表现。但在革命阵营内部，如果分不清本质与现象、主流和支流，就会受到资产阶级散布的悲观论的影响，极易被刘、林、邓一伙的反动思想所俘虏。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对此提高警惕。

邓小平一伙很喜欢谈论阴暗面。但是阴暗面在哪里？难道不正是他们自己吗？他们这些党内资产阶级，完全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一堆“新”垃圾。他们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破坏和干扰革命大好形势的主要根源。邓小平一伙不是把自己打扮成搞经济、抓生产的“行家”、“里手”吗？但正是他们，大搞“利润挂帅”、“产值挂帅”，妄图把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变成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正是他们，大搞“管、卡、压”和“物质刺激”，严重地挫伤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是他们，鼓吹“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不惜将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白白地送进外国资本家的腰包里。也正是他们，先是借口生产压制革命，当他们眼见形势对自己不利时，竟公然破坏生产来对抗革命，甚至狗急跳墙，一手挑起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无数事实证明，哪里有他们在捣乱，那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怪事。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揭露了邓小平这一伙，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才能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才能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黑暗不可怕，支流不可怕，天崩地裂不可怕，即使是革命遭到暂时的曲折、反复甚至失败，同样也不可怕。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面临着比自己强大千百倍的资产阶级，我们的革命导师就已作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光辉预言。而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邓小平一伙，却抓住几片鸡毛蒜皮，散布悲观论调，妄图阻挡亿万人民前进的步伐，只能是螳臂挡车，必然要遭到彻底破产的下场。不论阶级敌人怎样疯狂地反对和破坏革命事业，不论自然界的破坏力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灾害，革命一定战胜反动，这是肯定无疑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那些资产阶级的可怜虫去哭泣他们的死亡吧，无产阶级革命的巨轮必将乘长风破万里浪，驶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明天。

# “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宫效闻

“条条专政”，是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回想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重搞“条条专政”的劲头是何等猖狂。你看，他到处发指示、作讲演，把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把生产搞“乱”了，搞“散”了，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是“闹独立性”，“削弱了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因此，他到处大叫大嚷：“该集中的，必须集中，不能分散”。左一个“统一”，右一个“集中”，好象少了他这个修正主义头子，少了他这个“条条专政”，中国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了，反动气焰嚣张至极。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不要集中，要不要统一？当然要。问题是集中统一于什么？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讲统一，最根本的就是要统一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统一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邓小平高喊的“统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不妨引录《论总纲》这篇黑文中一段妙语，它说：“不容许任何党员、任何干部拉山头，搞宗派，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和单位搞成独立王国。”难道“条条专政”就不是反动的“独立王国”？！“条条专政”就不是典型的“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这里，邓小平恰恰只提“地区”，不提“条条”，这只能说明他反对“独立王国”是假，反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的领导是真，反对“自成系统”是假，搞“条条专政”是真。而所谓“统一”，实际上是要“统一”于修正主义的“条条专政”，“统一”于邓小平一伙。

一切工作究竟是统一于党的一元化领导，还是“统一”于“条条”，这实质上

是个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地迅速发展国民经济，需要有一定专业分工的管理部门，即所谓“条条”。但是，我们从来认为，一切“条条”都只是党完成某项经济工作或其它工作的职能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各个“条条”也只有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种“条条”同党的领导的关系，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向全党明确指出：“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而邓小平的“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根本对立的。他的所谓“集中统一”，无非是不作任何分析地片面强调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垄断发号施令的权力，从而从根本上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这样的“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这样的“条条专政”必然不顾国家的统一计划，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 and 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总之，邓小平的“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道道地地的挂“集中统一”之羊头，卖修正主义之狗肉。

为了重搞“条条专政”，邓小平在“集中统一”的旗下，还摆出了一副“我就是中央”的架势，公然同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教导大唱反调，完全否认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重要意义，搞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毛主席历来强调：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但是，邓小平却胡说什么，企业由地方领导后，“许多

事情没有人管”，“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大喊大叫要“收上来”。究竟是要“收”，还是放？是一个积极性好，还是两个积极性好？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中小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工业的迅速发展，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是，邓小平却闭眼不看这些事实，千方百计要扼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了对地方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挥舞三根大棒：即收权治“散”，整顿治“乱”，引进治“慢”。于是，在计划体制上，他们完全是条条独揽，根本不讲条块结合，更谈不上以块为主；财政经济上，无止境地挤块块，补条条，搞竭泽而渔；企业管理上，反对“鞍钢宪法”，“王法”多如牛毛，疯狂地推行“管、卡、压”；在两条腿走路方面，只搞一条腿，不要大中小并举，不要农轻重为序，不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是以大压小，重工轻农，搞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这样的“集中统一”，究竟搞的是哪一家的专政，究竟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引到什么道路上去，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条条专政”不要地方的积极性，归根结蒂是不要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邓小平的眼里，人民群众简直是无知的群氓，“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什么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什么工人参加管理，这些都是“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是需要通过“集中统一”加以“整顿”的。正是怀着这种刻骨仇恨，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不仅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了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邓小平的指挥棒一转，“条条专政”的一本本“王法”、一个个“条例”就竞相炮制出笼。那个臭名昭著的《条例》，就是“条条专政”的典型作品。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那依靠谁是“绝对”的呢？当然是那些党内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了。这不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热衷于搞“条条专政”，必然要走向资本主义

复辟的大门。而一切修正主义者之所以那样热衷于搞“条条专政”，也就是因为“条条专政”更便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苏联变修的教训就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一上台，为了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瓦解社会主义统一计划经济，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搞“条条专政”，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连共产党的名称也不要了，搞什么“工业党”、“农业党”，其实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所谓“新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由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持全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大权，实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兼并，推行生产联合公司，搞“条条”的绝对化的垂直领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经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今天，邓小平步苏修前辈的后尘，大喊大叫要“集中统一”，重搞“条条专政”，其目的也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去年在各地各部门中，凡是那些受邓小平“条条专政”影响越是大的地方，右倾翻案风也就越是刮得厉害，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也就越是受到压制和歧视。因此，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会名存实亡，而变成一小撮走资派控制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就要在中国复辟了。

恩格斯在痛斥机会主义者高喊“统一”时曾经指出：“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致奥·倍倍尔》）邓小平打着“集中统一”的旗号，大搞“条条专政”，不就是分裂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吗？“条条专政”名为“集中统一”，实质上是在搞独立王国，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专政，对广大群众实行专政。今天，邓小平已经下台了，但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并未完全肃清。今后，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仍将是长期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一天不结束，这个斗争也就一天不会结束。批邓就是批修。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 工人参加管理就是好

中华造船厂党委中心学习组

工人参加管理，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我们同邓小平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在无产阶级看来，工人参加管理，是企业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项重大措施。但是，邓小平以及他授意炮制的那个修正主义企业管理的《条例》，却恶毒咒骂工人参加管理是“不务正业”，“反对规章制度”，诬蔑工人参加管理“造成无政府状态”。总之，在邓小平的眼里，工人参加管理完全是糟得很，不是什么好得很。

说什么工人参加管理是“不务正业”，请问：工人的“正业”是什么？在资产阶级看来，工人不过是会说话的机器，工人的“正业”就是当牛作马埋头干活。不论资本家还是走资派，无不遵循这个反动逻辑。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厂的企业管理大权基本上被走资派、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把持。当时，铸锻车间有位工人气愤地责问旧党委书记：“我们的工厂是社会主义企业，我们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为啥要让资本家来管我们？”回答他的话是：“这事你管不着，你只要管好镗头，做好生活就是了！”看，这和旧社会资本家的腔调有什么两样？！恩格斯说过：“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共产主义原理》）由于工人群众根本无权过问企业管理，厂里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利润挂帅”、“产值第一”、“物质刺激”、“奖金制度”无所不有。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际上正处在蜕变为走资派——资本家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工厂的过程中；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正在蜕变成雇佣关系，猫鼠关系。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复辟图景啊！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曾再三强调要“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并且尖锐地指出：“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齷齪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怎样组织竞赛》）邓小平及其授意炮制的《条例》死死抱住被列宁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陈腐偏见”，公然指责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不务正业”，要挟工人群众放弃当家作主的权利，不就充分说明，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吗？他们拚命扼杀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鼓动“不怕被第二次打倒”的走资派把已失去的企业管理大权“夺过来”，不就是要重演文化大革命前相当一部分企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景吗？

《条例》攻击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又一奇谈怪论是：“反对规章制度”。反对什么规章制度？《条例》根本避而不谈。在阶级社会里，规章制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厂里的老工人一提起旧社会资本家的“厂规”，就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一条条“厂规”，实际上是资本家为了尽量榨取工人的血汗而套在工人身上的一根根锁链。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我们厂的规章制度真是多如牛毛。单是产品质量检验制度，款项就多达七十多条。有个电焊工人不慎在一块无关紧要的隔舱板上烧穿米粒大的一个洞，检验人员翻开规章制度，要他罚款八百元，而且规定自此不准带徒弟！看，这样对工人管、卡、压的规章制度，跟旧社会资本家立的厂规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不反掉，工人就永远只能是作为守法的奴隶，而不可能是工厂企业的主人。正是由于这样，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一开始，我厂出现的第一个工人调查组，和科室人员一起，首先就是从批判修正主义的检验制度开刀的。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批判、取消管、卡、压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正是为了建立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改善企业内部人们相互关系，有利于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比如，我厂船体车间电焊三班和造船车间自动电焊班，是两个焊接质量“自检免验”班组，产品质量完全由班组工人自己管理，他们根据实践经验，分别制定了六项符合生产技术规律的规章制度，坚持自觉遵守执行，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焊接质量。今年以来，他们不仅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而且焊接质量合格率月月达到百分之百。但是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势，根本无视工人群众的创造，大叫大嚷工人参加管理搞得企业一“乱”二“散”，要“严格规章制度”，对工人“严加管束”。很明显，他这样声嘶力竭地叫喊，目的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被工人群众批判、废除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重新搬出来，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改革规章制度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要不断调整企业内部人们相互关系，就要坚持发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邓小平还别有用心地胡说什么，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这完全是贼喊捉贼。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所谓“无政府状态”，就是不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不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而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正是为了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保证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落实，使工厂企业永远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邓小平口口声声诬蔑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无政府状态”，那么，他究竟要的是哪一家的“政府”？请看，他重新工作以后，立即就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反对党的领导，重搞“条条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推行“物质刺激”；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对工人当家作主，大搞“管、卡、压”。总之，邓小平反对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搞无政府主义的头子。而且事实也证明，他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泛滥到哪里，那里就遭灾。“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要改变“无政府状态”，最根本的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当前就是要抓住批邓反右这个大方向。而邓小平以及《条例》的炮制者却倒打一耙，这只能说明一切修正主义者手里没有真理，只好采取造谣和诬蔑罢了。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工厂企业的管理是依靠少数人，还是依靠工人阶级，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大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革命》）邓小平叫嚷“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是他资产阶级本性的大暴露。什么“相对的”，说穿了就是跟他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跑的就“依靠”，反对的就要镇压。这种“相对论”的实质，就是要工人阶级俯首听命，任他搞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早在解放前夕就明确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走“鞍钢宪法”的道路，使工人参加管理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新的发展。一九六八年，我们厂出现了一百多个工人调查组，有力地推动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几年来，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通过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提高了我们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在党委的领导下，出现了象工人管理委员会、工人生产指挥小组、工人技术参谋队等多种以工人群众为主体的管理形式。我们从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管路线、管方向，才能推动各项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如果按照邓小平及他那个修正主义的《条例》去办，“加快”的决不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而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早就说过：“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邓小平把工人参加管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加以扼杀，这恰恰说明，工人参加管理就是好，好得很。因此，不管今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尖锐复杂，我们都要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团结批邓在一起

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一车间 王炳英

我是一个青年工人,不久前刚担任车间党总支副书记。象我这样一个工人新干部,经过批刘、批林,现在又在批邓,今后还会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呢?通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到工人群众中去,不断接受再教育,才能增强对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记得去年邓小平挥舞“整顿”的大棒,鼓吹建立“严格的规章”时,车间里许多工人和干部都竭力反对。但是,有一个时期,我看到少数工人劳动纪律一度有所松懈,就想组织几个干部分头到厂门口、医务室去“调查”工人上下班的情况。这个错误设想虽然并没有实行,但说明我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头脑里还存在着“依靠少数人管多数人”的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存在,正是开始脱离工人群众的反映。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打响了。我们车间干部和工人同学习、同批判,受教育很深。二号炉的老徐师傅,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搞成不锈钢固体渣保护浇注的新工艺,使原来只炼渣子不炼钢的二号炉获得解放的事实,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老工人程子清在文化大革命前,受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为了保住车间的“安全奖”,冒险安装安全装置,失去了一条腿。他用一条腿批判邓小平的一条“线”,气愤地说:“安全奖不安全,文明生产不文明,修正主义路线害死人。如果让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得逞,我们工人失去的不仅是一条腿,而且会丧失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一定要用还剩下的一条腿,坚定地走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同邓小平对着干!”

工人群众的愤怒控诉和批判,表达了广大群众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热爱和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无比愤恨。大家一面集中火力批邓,一面提出了“不客气,不生气,团结批邓在一起”的口号,和干部一起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本厂的影响,使大家的觉悟都有了显著提高。正是通过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出来,少数工人纪律松懈的现象就很快得到了克服。

我们深深感到,要使批邓斗争不断深入,干部就必须带头批,到工人群众中去一起批。特别是上级领导机关,更应这样做。从我们工厂来看,许多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套做法都是来自上面,来自邓小平。例如什么几条“王法”,各种陈规旧章,都是邓小平通过各种机构或会议传下来的。因此,不仅是我们的工厂和车间的干部,而且上级领导机关的同志也应该到工人群众中去实行三同,听听工人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控诉。只有这样,才能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真正批深批透,肃清余毒,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 说“官”

戚承楼

《聊斋志异》中有篇《夜叉国》，说的是一位商人漂游到夜叉国的所见所闻。当茹毛饮血的夜叉们在跟商人交谈中听到“官”这个字眼时，竟大为惊奇：“何以为官？”商人回答道：“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

这一问一答，的是传神之笔。当商人口中吐出“官”字时，敬畏与艳羡之状溢于言表，瞧，坐的是好车子，住的是高房子，堂上一呼，堂下百诺，人们见了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啧啧，多神气呀！但夜叉国的国民们却根本不知官为何物，要是真的见到一位神气活现的大官儿，其好奇与热闹大概不会亚于小孩子们围观猢猻出把戏吧。

蒲松龄笔下的这个夜叉国，究竟在哪一洲哪一洋，不妨留待那些对这类题目有兴趣的文学史家去考证吧。不过，在人类历史上，可确实有着根本不知官为何物的漫长的时代。封建史家为了美化封建制度，总是说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皇帝百官，其实当时的所谓女娲、伏羲、神农、轩辕等等，大抵不过是在一个氏族内部当家的老妈妈、老爹爹而已，就象夜叉国里也有一个大夜叉一样。他们既不脱离劳动，又不闹特殊化，儿子们和孙子们还可以随时将她或他撤职。尽管后人称他们“皇”呀“帝”呀，尊贵得很，但他们的威权其实是连旧社会一个保甲长都比不上的。

只是当一个阶级成为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者时，管理者才成了官。汉武帝时有个卜式，原先是个牧羊的，因为捐献了家产充当抗击匈奴的军费而当了官。汉武帝称赞他牧羊牧得好，他就用他的牧羊的理论来推广到管百姓上去——

“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

怪不得古时候称地方官为“州牧”或“牧守”。管理者同官划上了等号，被管理者也就同羊划上了等号。夜叉国里的亲属关系，终于代之以文明国里的牧羊关系。官儿们放牧着成千上万的两足羊，自然得喝羊奶，吃羊肉，剪羊毛，剥羊皮；而且还不劳官儿们自己动手，自有衙役们会逼着羊们把奶、肉、毛、皮等等送上门来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成了天经地义了。

当官的好处那么多，于是人人（当然不包括根本没有当官希望的羊们）就都想当官，于是有了“官迷”。韩非在《五蠹》里说到，在三皇五帝时期，尧、舜、禹这些当头头的，同群众一样吃粗粮，喝野菜汤，还要带头劳动，辛苦得连腿上的毛都长不出来，所以“禅让”是并不

稀奇的。后来不同了。当了一任县太爷，好几代子孙都可以坐上马车。官的职位，既然成了这样的聚宝盆，因此，没有位子的，千方百计要得到一只位子；有了一只小位子的，还要得到一只大位子；得到了位子，就要拚命保住这只位子，还要把这只位子传给儿子和孙子们。二千年前的孔老二，三月不做官，便要慌得灵魂出窍，可谓官迷的鼻祖。官迷一多，就得定个规章制度，以免为抢官做而打破了头。起先是按功论官，如以按照砍下敌人脑袋的多少，来作为评级别、定待遇的依据，因此脑袋叫做首级。还有读书做官。悬梁刺股，囊萤挂角，付出的苦劳和疲劳够大了，不捞个官儿做做才冤枉呢。除此以外，名目尚多，不及备载。

但另有妙文一段，是不可不抄录在下面的——

“我白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去劝说人家投我的票，我赔了好几亩的玉米和土豆。我送掉了两只小牛、五只羊给人家拿去吃掉。”“我走了六千四百八十一英里的路，握过九千八百四十七次的手。”“我参加过二十六次竞选宣传会，跟九个寡妇谈过恋爱，还给狗咬了三十九次。”

这是前些年刊登在西方某报上的一则启事，作者是一位落选议员。真是的，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人们还是有眼不识泰山，这个世界可真有点颠三倒四了。呜呼，壮志未酬，英雄流涕，奇才不遇，学士丧气，这位落选议员的悲哀，是做不到官的官迷们的共同悲哀，而这种悲哀，如同当了官以后的神气一样，夜叉国的国民们也是怎么也体会不到的。

如此说来，那位访问夜叉国的商人把官儿描述得如此八面威风就有点不确了。不仅做不到官的有做不到官的苦恼，就是做到了官的，也有争大嫌小、升降调迁的苦恼以及做不成官的苦恼。何况，官儿们尽可以自拟于牧人，但百姓们终究不同于羊。恩格斯说得很深刻：“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压迫必有反抗。“天街踏尽公卿骨”，什么乌纱帽，粉底靴，蟒袍玉带，朝珠花翎，连同封妻荫子的壮志，经国济民的奇才，还不都得变成一滩烂污泥。事物总是螺旋形发展的：从没有官，到有官，最后还得发展到没有官。试看今日之世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部分土地上，不就已经摧毁了剥削阶级的官僚制度了吗。

但是，新事物中有旧痕迹。今天我们所建立的，还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但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还存在着各方面的差别，对这些，必须努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须知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还会孕育出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对群众大搞“管、卡、压”，就是这样的一伙修正主义大官。但他们要保护和扩大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队伍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必将实现恩格斯的伟大预言：“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 “摘句”与“拳术”

包斯文 蒋桐发

“摘句”即摘抄字句，“拳术”为打拳之术，两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可一经邓小平之手，“摘句”便成了他的一种“拳术”了。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毒草一出笼，邓小平一伙就神气活现地扬言：“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可谓气势汹汹，拔拳行凶。那么，既然是拳击，必有拳术。邓小平一伙的拿手好拳大抵要算“摘句”了。可不是吗？仅《总纲》一文，炮制者就摘引革命导师词句达五十条之多。他们采用种种卑劣手法，或是断章取义，歪曲原意；或是截头斩尾，阉割实质；或是釜底抽薪，为我所用；甚至无中生有，公然造谣。手段的卑鄙是为了目的的卑鄙。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一伙的一句自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炮制《总纲》时，他们曾得意忘形地宣称：“有许多东西，把主席的话引来，一下子就站住脚了。”寥寥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这种“摘句”式的拳术，正是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摘句”虽是蹩脚的拳术，可它往往乔装打扮，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使人迷离恍惚，上当受骗。鲁迅在揭露反动文人用“摘句”“困人”的鬼伎时，曾指出：“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惆怅。”（鲁迅：《“题未定”草》）难怪历来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对“摘句”之术顶礼膜拜，奉为至宝了。

曾记否？当年，彭德怀不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摘来片言只语，当作飞机大炮，向党猖狂进攻吗？刘少奇在黑《修养》中，不是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光辉词句拦腰砍掉，为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吗？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狂叫“讲马义〔马克思主义〕就要断章取义”，作为其反革命政变的武器。可谓“拳”势汹汹，不可一世，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然而，“摘句”之术如同捣鬼之术，“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鲁迅：《捣鬼心传》）刘少奇、林彪一伙的“拳术”，早被亿万人民的铁拳打得粉碎。邓小平又怎么能逃脱这种命运？他们这个“拳头”还没来得及“打出去”，就被人民连胳膊一把捉住，成了翻案复辟的罪证。

邓小平行拳有术，人民破拳有法。这个法又是鲁迅告诫我们的：“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一篇篇印刻在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中。我们只要“顾及全篇”原著，认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不会上邓小平一类骗子的“摘句”术的当。相反，倒是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鲁迅：《两地书》），把伸向无产阶级的邓小平这个反革命“拳头”打得粉碎。

# 批邓不停 生产跃进

中共上海跃进电机厂总支委员会

我们上海跃进电机厂，是生产小型交流电动机的工厂，现有职工一千多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于坚持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出现了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一九七五年，我厂平均每人每天生产的小型电机达到了二台（按直接生产电机的工人计算），比一九六五年翻了十倍。品种从单一的仿造外国，发展到能自行设计制造航空、船用、钻探、国防等方面一千多个品种规格的小型交流电机和高级精密特殊电机。今年，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一步激励了广大职工大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今年上半年完成的生产实绩，超过了历史上同期最高水平，国家急需的短线品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六倍。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实现了冲剪、嵌线、金属切削、装配、油漆、检验等九道关键性工艺的技术改造，形成了十六条生产自动线，自制高效率设备一百多台，实现较大技术革新项目三百多项，基本上实现了道道工序有革新，台台设备有改进，使我们这个原来设备落后的工厂，出现了新的面貌。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只有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生产才能迅速发展。正如工人同志所说的：“批修步步深，生产日日新，跃进厂才能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胡说什么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就会破坏生产发展，这只能暴露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它代表着反动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大障碍。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正是刘、林、邓这一伙党内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只有对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才能大大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被修正主义路线压制着的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推动生产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突飞猛进地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厂的广大干部、群众是深有体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厂曾实行所谓“资金本票”制度，一切生产活动都以“利润”为原则，班组与班组、车间与车间，以及班组、车间与厂部之间的来往，都以“本票”支付，连小

组领一把刀具，这个小组向那个小组借几个工人，都要支付“现金”（本票），把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搞资本主义，对外也就要搞卖国投降主义、搞洋奴哲学。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厂一直生产单一的仿照外国设计的产品，虽然这种产品设计落后，但仍然照搬照抄，不准越“洋轨道”半步。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厂内资本主义歪风盛行，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生产水平很低，每人每天平均只能生产电机零点二台。

事实证明，只有批判修正主义，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奋起造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夺回了被窃取的一部分权力，狠批了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破除了修正主义的管理制度，大大激发了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广大工人针对生产上的落后状况，提出了“打倒洋奴、闯出新路”的口号，以短短十天时间，自己设计、制造成功了先进的中国式小型电动机，抛掉了仿制的帽子。这种电动机在同样功率下，体积比老产品缩小了三分之二，不仅节约了大量金属材料，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了适应电机产量迅速增长的需要，广大工人决心自己动手，改造老设备。原来我厂电机的转子、定子的冲片，都是用老式冲床生产的，踏一脚，冲一片，冲床车间被称为“踏一脚”车间，既慢又不安全。怎样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开始有人主张向国外进口多工位冲床，但外国资本家却乘机敲诈勒索，还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工人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不能自己造？”他们在没有样机、没有图纸、没有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边摸索、边试制，经过一年多奋战，终于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四工位高速冲床。一台可以代替二十二台老式冲床，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六倍。这些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不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就不能贯彻；不批判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立不起来。只有坚持“批”字当头，真正弄清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危害，分析它的实质和根源，才能真正从路线上划清是非界限，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们的思想上和行动上深深扎下根。路线搞对头了，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不断完善了，才能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从而促进生产的不断跃进。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而生产中的具体矛盾，往往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着。因此，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地分析和解决生产中的具体矛盾，自觉抵制修正主义的影响。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认为批修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呢？就是因为联系实际不够。有时批归批，做归做，批的时候可能头头是道，做的时候又会糊里糊涂。有一件事给我们的教育很深。我们厂生产上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任务要增、品种要翻，而机器设备陈旧。当时，电机转轴是一人一机一刀地加工，班产不到一百根，成了卡住生产大幅度上升的喉咙口，同志们决心搞转轴加工自动线。但是，在设计机械手时，专业设计人员认为，这样大型自动线的机械手，

需要七只电机，工人却不同意，提出了一种简易的方案。究竟采用哪种方案呢？领导班子里产生了两种意见。有人说，搞生产，工人有经验；搞这样的大型自动流水线，应该听专业设计人员的。这种思想一出现，引起我们的很大警觉。我们走出办公室，到车间、班组去作调查研究，看到专业人员提出的那个方案，的确是脱离实际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片面相信技术人员总是对的，而工人的方案就是不行呢？这说明，虽然我们也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专家治厂”，但是，由于联系实际不够，教育不深，因此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的思想，一碰到具体问题，“专家治厂”的流毒就又冒头了。如果我们不加警惕，文化大革命前“权威动口，工人动手，专家搞‘创造’，工人跑龙套”的情况又会发生。因此，我们抓住这件事，发动群众，狠批“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联系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依靠一个机械“权威”，设计一条机座加工自动线的反面经验作为教材。当时，这些所谓“机械权威”，用了七年时间，花了几十万元资金，结果搞出来的却是条“死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由工人改造成功。这个死龙复活的教训，说明“专家治厂”实在害死人。为了把“专家治厂”这个修正主义货色批透，我们还从理论上分析了“专家治厂”的思想基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天才史观”的鼓吹者，他们看不起人民群众，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刘少奇把工人群众污蔑为“破椅子”，林彪说劳动人民只知道“油盐酱醋柴”，现在的邓小平，不是也叫嚷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吗？他们相信的就是他们自己这些“救世主”、“神仙”、“皇帝”和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他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腐朽势力的历史唯心主义者。由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了“专家治厂”的实质，教育就比较深刻。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我们还热情支持了工人群众的意见，和专业设计单位相结合，成立了转轴线三结合设计组，请一位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担任组长，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就使一条能够自动夹装、切削、测量、进退料的转轴加工自动线，正式投入了生产。现在，每加工一根转轴只需要五十秒钟的时间，生产效率提高了六倍多。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长期的，批判修正主义也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如果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产生“松口气”、“歇歇劲”的思想情绪，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在我们工厂中，生产任务很忙，工作千头万绪，更不能批批停停。生产越忙，越要革命大批判不断。比如，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前，我们厂制订了一个五年内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规划，要求把小型电机的生产水平提高到每人每天平均三台。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有些同志一心忙着想多搞几条自动线，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该批的都已经批了，可以“歇一歇”了。思想上一松劲，路线上就“亮相”。当时，社会上正刮起一阵右倾思潮，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货色又沉滓泛起。这种思潮也影响到我们厂里。个别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就利用我们放松革命的机会，乘机兴风作浪，

散布流言蜚语，大搞违法乱纪活动，厂里歪风邪气上升。在技术革新上，由于忽视了思想教育，在少数人员中也出现了“游码头、抢镜头、别苗头”等不良倾向，影响了生产和技术革新的继续发展。工人们尖锐地批评我们是：“只抓自动线，丢掉了基本路线。”有的说：“照这样下去，生产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企业也要变成资本主义的了。”工人群众的这些批评，使我们认识到，“松口气”、“歇歇劲”的思想，实质上是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放松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彻底革命的精神。思想认识提高以后，我们便在全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并且发动群众，揪出了混在我们领导班子中的坏人，打击了歪风邪气。这些现实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教育了我们，批判修正主义，必须天天批、月月批、年年批。不然，不仅生产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了，也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使企业走到邪路上去。邓小平不是一上台就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公开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吗？他的罪恶目的，也就是想麻痹我们的革命斗志，掩盖一小撮党内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因此，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头子对着干，就要一时一刻也不放松对党内资产阶级和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坚持用基本路线统帅生产自动线，用革命猛促生产。

批邓不停，生产才能持续跃进。今年以来，我们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三批邓小平鼓吹的“崇洋迷外”的“大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工人群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原来，按照我们制订的五年规划，要实现每人每天平均生产电机三台的目标，厂房要新建，一些专用设备、流水线要靠外厂协作，加工材料要等外面运来。如果等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起码还要两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推动下，工人们提出“不向外伸手要，边创造条件边赶超”，决心奋战一百天，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提前实现五年规划的目标。革命大批判高潮进一步推动了大跃进的浪潮，全厂职工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大搞单机自动化，有的把原有设备加以改造，联结成简易自动线，有的以班组为主开展小改小革。全厂每个车间、每道工序、每个班组都制订了实现赶超规划的具体措施，定目标，排计划，搞得热气腾腾。最近，唐山、丰南人民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以顽强的革命毅力进行抗震救灾的消息传到我厂，对全厂职工更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家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用“灾区损失我们补”的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推动生产更上一层楼。现在全厂已成立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二十多个突击队；各级干部和科室人员也纷纷到车间、班组，与工人实行三同，学、批在一起，大干在一起。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我们决心进一步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批示，坚持继续革命，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把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 抗震救灾 人定胜天

## 山崩地裂 视若等闲

忻 启 明

对于地震，对于一切严重的自然灾害，不同的阶级历来有着不同的态度。“山崩地裂，视若等闲！”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唐山等地人民在地震面前的光辉写照，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对待地震的响亮回答！

是的，山崩地裂并没有什么可怕。整个自然界就是在山崩地裂中前进的。正是山崩地裂，才造就了地球上的江河湖海、崇山峻岭、万里平畴；正是山崩地裂，才使生命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正是山崩地裂，才使人类的祖先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大小地震达五百万次，几乎每分钟就有十多次。但是，地球不是照样转动，人民不是照样革命，社会不是照样前进吗！唐山等地区遭受的地震如此强烈，但又怎么样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推动下，不是已经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吗！唐山的工人阶级说得好：“地可以动，山可以摇，但是工人阶级钢铁意志和革命信心是不可动摇的。”

对自然界的斗争是这样，对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无产阶级对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斗争，从来都是充满必胜的信心。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旧制度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社会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列宁，《当前的主

要任务》)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不都是经过了这样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斗争过程吗?我们的党也正是在斗争中前进的,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可以说是十次“山崩地裂”,但都丝毫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出了刘少奇一伙,昆仑山不是没有被推倒吗!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庐山不是没有被炸平吗!现在又出了邓小平,煽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闹事,恨不得一口吞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阴谋被粉碎后,天安门不是显得更加雄伟壮丽了吗!“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山崩地裂,天下大乱,这只能吓倒那些神经脆弱的修正主义蓬间小雀,丧魂落魄地去寻找什么仙山琼阁。而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象鲁迅说的:“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坚持革命,坚持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

无产阶级之所以对自然灾害和阶级斗争具有这种“视若等闲”的革命气概,是由于无产阶级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间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坏事和好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样,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就能够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从困难中看到光明,从斗争中看到胜利。不错,地震会给人民造成损失,但也锻炼了革命者的革命意志,在困难中更显出英雄本色。阶级敌人的捣乱也确实会给革命带来危害,但斗争可以暴露敌人,教育人民。如果对于地震只看到造成损失的一面,而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抗震救灾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到处都在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对于阶级敌人的捣乱,只看到给革命造成危害的一面,看不到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只是表明他们已经接近灭亡,看不到人民群众革命觉悟的不断增长,看不到革命正在胜利前进,那就不能算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况下,我们要永远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从思想上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无论是高奏凯歌的胜利之日,还是山崩地裂的艰难之时,都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促进事物的

革命转化，推动革命的胜利前进。

当然，胜利的果实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坏事转化为好事，决定的条件是人的因素，是先进阶级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路线。我们要战胜自然灾害，战胜阶级敌人，不仅要有敢于胜利的革命气概，更重要的还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战胜一切反动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法宝，也是战胜自然灾害的法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人与自然的斗争，总是跟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斗争又总是集中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解放以来，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的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就同刘少奇一样，被困难所吓倒，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大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妄图扭转革命的方向。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这种倒行逆施，虽然是他们腐朽没落的写照，但也从反面告诉我们，要战胜自然灾害，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当前，就是要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各项工作。同时，要警惕阶级敌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必须坚决给予打击。只有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能做到人定胜天，这是一条已为事实所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真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经得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考验，也经得起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验。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我们就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一切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 “干部最后走”

潘 益 大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当强烈地震使唐山开滦煤矿吕家坨矿电断、风停之后，正在井下战斗的六百多名工人、干部脱险的唯一出路，是穿过复杂的巷道，从备用竖井里攀登到地面上来。在这危急关头，该让谁先走？干部们的回答是：让群众先走，干部最后走！四个多小时以后，当人们按照规定次序逐个安全返回地面时，最后一个撤离井口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在井下负责指挥的矿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

“干部最后走”——说得多好啊！它虽然只有寥寥五个字，却字字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字字凝结着革命干部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精神。目睹此景此情，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另一幕情景。

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四川、山东先后两次强烈地震，山崩地裂，江水泛滥，瘟疫盛行，饿殍遍野，灾情如此严重，达官贵人照常天天饮酒作乐，不闻不问，行若无事。另一次黄河发大水，当时河南的大小官僚们闻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纷纷连夜卷起金银细软，带着姨太太坐飞机溜之大吉。更有甚者，乘机巧立名目，抽捐派税，大发其“赈济财”。这就是当时的“官”“民”对立的历史，即两个阶级尖锐对立的历史。今天，同样在自然灾害面前，无产阶级的干部想的是人民，为的是群众，不惜为此而冒牺牲个人生命的危险，这是多么高尚的风格。两个阶级两种“官”，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人们正是从这种对比中，看到了无产阶级干部作为“社会公仆”的崇高形象和革命本色。在余震不断发生的百米深井下，在井下多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早走一分钟，就早一分安全。可是，我们的干部明知最后走是有危险的，却还是心甘情愿地“最后走”，没有丝毫利己主义的打算。“前”一步固然安全，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却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他就把自己置身于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的地位，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大大后退了一步；“后”一步当然危险，但正体现了“社会公仆”的政治本色，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大大前进了一步。一“前”一“后”，性质迥异。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广大革命干部之所以能在紧急关头抢险在前，撤退在后，群众利益在前，个人安危在后，就因为他们都是以这个标准作为衡量自己“前”与“后”的尺度的。毛主席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正是从这个唯一的宗旨出发，自觉地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这已成为我党干部的光荣传统。我们从“干部最后走”的壮举中，不是看到了这种光荣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到了发扬光大吗？

“干部最后走”的英雄行为，决不是偶然发生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开滦煤矿各级干部响亮地提出了“不当桌上司令，不靠电话要煤”的口号，经常有二分之一以上的

人深入基层，和工人搞三同，拜老师，学手艺，划等号，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从而同工人们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干部最后走”的英雄行为，正是他们平时长期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怎么可以设想一个平时从不下井，整天在井上向工人发号施令的人，一旦置身在危急关头，能首先为人民利益着想，经得起“最后走”的考验呢？

当然，象在百米深井下发生地震时谁先走后走这样的考验，我们是较少遇到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看待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却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正因为这样，“干部最后走”这句话的意义已远远越出了一时一地的范围，给一切干部提出了一个办事情、想问题、搞工作的根本准则，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前，把个人利益放在最后。

这就是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内容。

## 干部的岗位在哪里？

龚 青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的强烈地震刚过，汽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玉珍从瓦砾堆上站起来，第一个驱车赶到市委请战；车站党委副书记刘绍璐不顾余震还在继续，不顾个人和亲属的安危，二话不说就赤脚跑回车站；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被抢救出来，第一件事是在大街上建立起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英雄们的行动，为一切革命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干部的岗位在哪里？就在斗争第一线上。李玉珍的请战何等响亮：“救护阶级兄弟需要我们，运输物资需要我们，宣传动员需要我们！”是的，革命事业需要党的领导，在困难的时刻尤其是这样。一个革命干部就是要敢于在困难面前挺身而出，敢于坚守作为领导者的战斗岗位，朝气蓬勃负起责任，排除万难做好工作。有困难和危险怕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为战胜困难战胜危险而工作、而斗争的。生命不息，斗争不止。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守在战斗的岗位上，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莫不如此。

干部的岗位在哪里？就在群众之中。无论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或者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之中，都应当与群众同命运、共患难。毛主席号召我们要与工农群众搞三同。在艰苦斗争的考验面前，我们更应该努力做到这一条。唐山的干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任何艰难困苦，都决计吓不倒决心与工农搞三同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邓小平这类走资派，才是一遇困难就搞临阵脱逃的软骨虫。是钢是渣，在炉火里炼；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正是在艰难困苦面前见分晓。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唐山等地的抗震救灾的斗争中，共产主义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扬。正是在灾区，困难在哪里，干部的岗位也就在那里；而干部的岗位在哪里，群众的岗位也就在那里。千群一心，群策群力，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间奇迹都将被创造出来。

# 地转实为新地兆

——读洪秀全的《地震诏》

韩天宇 陈宗海

一八五三年五月，南京地区发生了一次六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据《句容县志》记载：“旬日之间，大震数次，屋宇播播，居民恐怖，有夜出露处者。”句容县离南京仅数十里路，因此，从这里的记载中，可以测知当时南京城所受的地震影响是很不小的。

当时南京的统治者是如何看待这场地震的呢？如果是昏庸的清朝总督、巡抚们，必定早已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不是求神告佛、祭天祷鬼，就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只求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然而，当时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在统治着这个城市。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后，英勇而灵活地摆脱了敌人的围困、堵截和尾追，从武汉顺江而下，一路上势如破竹，于一八五三年三月攻克南京，定都改名为天京。这个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建都才只两个月，便遇上了这场强烈地震，这对农民英雄们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怎么办？就在这大震刚过、余震未断的时刻，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洪秀全毫不迟疑地提起朱笔，在三尺黄绸上迅速而果断地挥就了一道《地震诏》——

万样动(魂)斧六日造，同(今)时今日好诛妖；

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

军行速追浩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

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道遥。

这道诏书是何等地乐观，又是何等地具有革命气魄！太平军刚一打下南京，立足未稳，清军向荣的部队就已尾随而至，驻营孝陵卫，号称江南大营。清军琦善的部队自河南赶至扬州，号称江北大营。在天京城内，有着大量的清军潜伏下来的奸细，如张继庚之流。再加上又遇上了这次强烈地震，真称得上是天灾人祸，继踵而至。当时的天京城，不仅面临着强敌压境的军事形势，经济形势也十分困难，为此规定了除前线作战部队外，城内男女各馆一律吃粥。在这种情况下，反革命分子趁机造谣惑众，妄图扰乱和动摇人心。但无论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或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都丝毫动摇不了太平天国军民们的革命意志和决心。洪秀全的这道诏书，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军民们的这种革命意志和愿望。此诏一出，士气大振，据当时记载：“癸好(一八五三)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天京的军民们不仅没有被强烈地震和强敌压境所摧垮，相反地，

倒是在严峻环境的考验中进一步磨炼了革命的意志,扩大和发展了革命的队伍。

地震诏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地震诏是宣言书。它对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宣告了政治上的彻底决裂。儒家之徒历来宣扬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官方哲学,鼓吹封建统治秩序是永恒的,万古不变的,妄图诱骗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永远受他们的统治。太平天国革命对于封建统治是一场震天撼地、山崩地裂的政治大地震,地主阶级反动头子曾国藩曾为此惊呼:“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活脱脱是一副情急败坏的样子。地震诏恰正与此相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热烈地欢呼自然界和社会的大变动,立志要在这剧烈的大变动中,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这种豪迈而宽阔的革命胸襟,是革命者所固有的本色;没落的反动阶级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地震诏是声讨书。它深刻地批判了儒家的那套“天人感应”的鬼话。孔老二修《春秋》,把地震列为灾异之首。从汉朝的董仲舒到宋朝的司马光、富弼之流,都无不把地震等自然灾害牵强附会地拉扯到人事上,造谣惑众,颠倒黑白,用来攻击进步势力,以维护其腐朽的反动统治。洪秀全的地震诏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它对反动阶级的没落的世界观是一个严厉的批判。就在洪秀全颁布地震诏的同时,清廷的反动头子咸丰帝为了“日旁忽现黑气”,又是下令钦天监的大小官员详细推算,又是亲自去天坛、太庙等处祈天祷祖,忙得不亦乐乎。他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扭转“贼匪肆扰”(诬指太平天国革命)的局面,永保大清的一统江山,岂非是痴人梦想!这两个不同的阶级,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地震诏又是进军令。“军行速追浩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这些气势磅礴的语言并不是什么空议论,而是当时切切实实地被执行了的。一八五三年五月,即在南京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同一个月,太平军分遣李开芳、林凤翔、吉文元率二万人北伐,赖汉英、曾天养率二万人西征。这两支英雄部队,打得清军抱头鼠窜,望风而逃,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并由此而建立了太平天国革命的鼎盛局面。

洪秀全的地震诏写成一百二十余年前,但在今天读来,仍然感到通篇闪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光辉。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性格,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百二十余年过去了。今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无论从觉悟、决心和能力来看,是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都无法比拟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狠抓阶级斗争为纲,必将越来越大地取得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必将以更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光明灿烂的希望

——上海郊区社队工业调查札记

市革委会郊区组工业组 王信荣 王魁元

市革委会工农组生产组 俞树泰 王曙光

我们几个人，接触社队工业都不久。这里记下的，是我们在对郊区社队工业作调查中的一些感受。

## 一条宽广的路

奉贤县奉城公社有个协新大队，它座落在东海之滨，地处偏僻，交通一向很不方便。但我们这次去，竟出乎意料地发现这里有一条宽广而笔直的农机路，从奉团公路分支出来，向南延伸直通协新大队。路两边的白榆虽然还很幼小，但都长得苍劲、挺拔。同这林带平行的，是一根根等距离的水泥电杆。入夜，路灯盏盏，比那天上的繁星还美得多呢！这是一条宽广的路——它不仅行走各种农机，而且是全大队的交通干道，社员们到政治夜校去上课，到三个电视放映点看电视，都豪迈地走在这条路上。

然而，我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条路，竟然完全是协新大队利用自己的力量修筑起来的。

“那得多少投资呀？”我们问。

“我们是同地下渠道结合起来施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杜说：“农业要机械化，没有路实在不行呀！可如果农村不发展社队工业，别说有了农机买不起，就是筑条路也只能在梦里想呀！我们这回把筑路和造渠并在一起，算得是俭省的了，也还投资了六、七万元呢！”

协新大队过去没有一条象样的路，不用说是拖拉机了，连跑自行车也不行。最近几年，协新大队发展了队办工业，每年可以为大队提供九万元的积累。这样，许多过去办不

到的事情便办到了。现在不仅渠道全部“地下化”，有农业机械大小几百件，而且还办了不少集体福利事业和文化设施。协新大队的变化是上海郊区农村的一个缩影。最近几年中，郊区各公社、大队从社队工业所提供的积累中，拿出来用于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平均每年达七千五百多万元，等于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二万六千多元。这样的建设规模，在社队工业发展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望着这条宽广的路，我们不由得感慨地想到，社队工业这项工作本身，不就正是在铺设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宽广道路吗？

但目前有许多人，对社队工业所开创的这条宽广道路还缺乏理解，一些同志对于办社队工业往往不去热情支持，而是存在着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有的担心全民所有制企业支援了集体所有制经济，会犯所谓“倒退”和“利润转移”的错误；有的怕办了社队工业会冲击农业，违反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有的怕麻烦，生怕办了社队工业会增加负担。从郊区有关部门来看，即使是在搞这项工作的同志，包括我们自己也往往不是很自觉地认识到它的伟大意义的。究竟应当如何认识，让我们来摆一些数字吧。截至一九七五年底，全郊区的社队工业已发展到四千九百七十六个，三十七万九千五百多人，年产值十亿零六千六百万元，占全市郊区人民公社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四。同时，在一九七五年中，社办工业的积累平均每个公社达六十四万元，队办工业的积累平均每个大队达四万五千多元。这就使得郊区人民公社三级经济的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那种“三级所有，两级几乎没有”的状况。现在，公社大队两级的总收入，在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四，而社队两级的总收入中，工业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二；公社大队两级的积累，占三级总积累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八，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社队工业提供的。不仅如此，社队工业的发展，促进和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又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这种局面的发展，缩小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促进着工业同农业的结合。

## 两条腿走路好

前一个时期，对于郊区社队工业的发展，有过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的一点是关于社队工业到底应当怎样发展。有这么一种看法，要发展社队工业，只能由上而下有计划地安排，不然，就会闹出许多乱子来。我们原先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次到宝山县罗南公社去一看，觉得情况并非如此。

罗南公社最近几年社队工业发展很快。一九七五年同一九七〇年相比，社办厂从四个增加到八个，年产值从八万九千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六万元；队办工业项目从十七个增加到九十二个，年产值从八十一万元增加到三百三十四万元。它在全郊区还算不上是一个

富公社，但考察一下它的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在市郊各公社中倒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罗南公社工业组的赵晋香同志就曾热情地给我们作了这样的介绍——

这几年社队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坚持依靠群众办工业。为此，除了由市、县有关部门自上而下地安排一些产品项目以外，我们还调动了各方面办工业的积极性。一是根据本公社内商业、财政等部门的同志联系面广的特点，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二是发挥一九五八年一批下放干部的作用，他们既了解农村，又熟悉工业，办工业的办法比较多；三是每年春节期间召开回乡工人座谈会，向他们宣传发展社队工业的意义，请他们考虑厂里是否有扩散、下放的产品。这样一来呀，办工业的门路就广了，什么鞋帮厂、马铁翻砂、镀锌、喷漆、抛光等等，就都搞起来了。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公社的社队企业，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这样搞起来的。

从罗南公社看全局，郊区社队工业所以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也正是由于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实行了两条腿走路的结果。据调查，全郊区四千九百多个社队工厂，属于自上而下安排的一共不到二百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于搞群众运动而办起来的。在郊区十个县中，上海县的社队工业由市县两级有计划安排的较多，但从一九七三年的情况来看，这个县由县工业局统一安排的项目也只有二十四，而自下而上办起来的却有一百零七个。一九七四年，这个县新建了六十七个社队工厂，其中有五十六个是自下而上办起来的。上海郊区的社队工业，如果不是贯彻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是单靠上面安排的话，那末，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也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模。

在依靠群众办工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或那种资本主义倾向。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原来就已存在着的，并不是由于发展了社队工业才开始有的，更不是由于依靠了群众办工业才带来的。相反地，在自上而下地安排社队工业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商品交换和货币制度，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发展社队工业中所存在着的资本主义倾向，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必须打击资本主义倾向，但决不能由于倒脏水而把澡盆中的孩子也一起泼掉，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变为限制社队工业，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变为批判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正如害虫往往喜欢寄生在嫩芽上一样，在社队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很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出现资本主义的倾向和活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去掉害虫，保护嫩芽，而绝不是把嫩芽连同害虫都一起除掉。

### 一种形而上学的顾虑

我们原来以为，在发展社队工业的问题上，农村干部的积极性是没问题的。这次下去一了解，发现有的县社干部对发展社队工业也存在着很多思想顾虑。原因呢？据说是

怕发展社队工业会影响农业生产。有的大队接洽到了某个工业生产的项目,报清县、社领导机关审批的时候,县、社领导上对凡是已经有一个“厂”或“组”的,往往是一概不再批准。因此,不少大队至今只有一个粮食饲料加工厂或农机修配组,而这两个项目一般都是提供不出多少积累来的。还有的硬性规定了一些“一刀切”的杠杠,诸如“投放在社队工业方面的劳动力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等等,并且以此作为检查公社、大队发展社队工业的方向是否对头的标准。

是不是什么地方农业上保持的劳动力比例越高,那个地方就越先进呢?不一定。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可以举一个事实:上海县、嘉定县、奉贤县是全郊区社队工业发展最快的三个县,而全郊区粮食亩产最先翻《纲要》的,恰恰也就是这三个县。嘉定县的徐行公社,是全郊区唯一的粮食亩产超双千斤的公社,它同时也是社队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公社之一。嘉定县的马陆公社和奉贤县的青村公社,社队工业的积累已经连续好几年在二百万元以上,很早就以“百万富翁”著称,而农业生产呢,在全郊区也都是名列前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技术和资金,使那里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了;同时,由于农业机械化解放出了大批的劳动力,从而创造了向着农业生产的深度进军的条件。相反,我们在这次调查中看到,凡是社队工业发展不快的地方,同社队工业发展得快的地方相比,农业生产的步子不见得跨得更大些,粮棉产量不见得更高些,倒是有些地方还及不上上述的那些单位呢。

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只看局部,不看整体,这是很害人的。拿劳动力来说,当然是首先要确保农业第一线的需要。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原来就不低,加上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势必将陆续解放出一批又一批的劳动力。比如,一台插秧机至少解放出二十多个劳动力,一架机动喷雾器顶替了三十多个劳动力,可见农业上的劳动力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即使在人少田多的地方,除了三个大忙季节之外的九个月中,农业上的劳动力也还是有余的。社队工业一般实行的是农闲务工、农忙务农的制度,因此,抽出一定比例的劳动力从事社队工业,非但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倒反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农业,促进了农业。

社队工业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直接方面,就是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大量的化肥、农药。我们在南汇县大团公社一个社办厂看到的事实非常动人。这个厂是专门生产土化肥、土农药的,全厂只有二十一名职工。自从一九七〇年建厂以来,在公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六年如一日,坚定不移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先后试制、生产了“五四〇六”、“九二〇”、“庆丰霉素”、“井冈霉素”、“七二一六”、“七〇二”等十多个新品种的化肥和农药。同时,他们还经常带肥带药下队,积极组织推广使用。一九七五年,全公社已有百分之四十的粮田和棉田使用了“九二〇”和“五四〇六”,其中棉花的当家肥,百分之七十都是使用“五四

〇六”，等于一百吨的有机质肥料。过去，大团公社是个老“缺肥户”，由于办了 this 厂，现在变成了“余肥户”，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两年，共余商品肥二百六十多吨。使用这些土化肥和土农药，既增加了粮棉产量，又降低了农业成本。去年，大扬大队六百多亩棉田全部使用“五四〇六”作当家肥，仅这一项就节约了七千二百多元的开支。

此外，全郊区已有的十六个社办水泥厂，一九七五年共生产了三万九千多吨水泥，有力地支援了农田基本建设。川沙县各大队铺设的地下灌溉渠道，有三百多公里的水泥管道，都是由社队工业生产出来的。

当然，由于现在还存在着商品制度，在发展社队工业中难免会出现利润挂帅的倾向。有的社队工业为了追求利润，挤掉了为农服务的项目或产品，热衷于搞利润高的产品，把农机厂变成了“工机厂”，化肥厂变成了“化工厂”，农药厂变成了“医药厂”，等等。也有的地方，不顾本社本大队的具体情况，把强劳动力集中在社队工业，农业第一线留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对于这种重工轻农、利润挂帅的倾向，我们必须进行批判教育。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看到了某些社队工业中存在着错误倾向，就把社队工业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去搞那种因噎废食的做法。

### 所谓原材料紧张的问题

社队工业要进一步发展，原材料的问题一直是比较突出的。这次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使我们感到，对社队工业的原材料紧张，必须进行分析。如果光靠计划调拨，原材料确实是紧张的，但如果能广泛发动群众，扫仓库，清垃圾，充分利用废旧物资和下脚料，这种紧张的状况是可以向不紧张的方向转化的。

一天，我们来到嘉定县南翔公社四联化工厂。厂党支部书记浦世农同志领着我们到处参观。在一堆晶莹洁白的东西面前，我们歌住了脚。浦世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氯化钾，它是从磺胺污水中提取出来的。磺胺污水是上海第二制药厂、大众制药厂的下脚，过去全部流入黄浦江，使水质受到了污染。现在，南翔公社四联化工厂把这批磺胺污水运来，大搞综合利用，从中提取了大量的氯化钾和贵重的磺胺。余下的污水，经他们自己制造的聚氯乙烯微孔吸滤管一过滤，基本上变成了清水，没有什么危害。浦世农同志一边介绍一边又把我们带到了塑料车间。车间里堆放着杂七杂八的废塑料，什么塑料娃娃的头啦，塑料拖鞋的搭攀啦，电线上的塑料套管啦，应有尽有。这些废塑料加进各种颜料，经挤塑机一滚一压，就成了各种颜色的大块塑料膜。然后再用机器一切一割，就变成了一粒粒的再生塑料。几年来，他们回收的各种废塑料达一万三千多吨。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它所废弃的下脚将会越来越多，这些下脚都是发展社队工业的极好原料。我们在崇明县住了几天，尤其觉得在社队工业原材料问

题上的悲观论点是不对头的。

崇明县堡镇公社三大队有个木制棋子工厂，每年生产各类棋子八十多万副，需要八百吨木头。可是，他们从没有耗费国家一根好木料，全是利用上海纺织器材厂、纱管厂生产纱管时剔除的副次料和切剩的边角余料制成的。还有，这个公社十一大队的小工厂，生产着几十种乐器零件。生产这些零件，需要用红木、榿木、乌木、黄杨木、紫油木等高级木料。这些原料非常紧张，他们就从上海管乐器厂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边角余料中去寻找，解决了生产上的需要。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黄杨木边料，原来是以每斤四分钱的售价卖出去当柴烧的，现在被利用来作为生产乐器零件的宝贵原料了。此外，这个县的马桥公社有个大队办了个锉刀厂，生产各种锉刀，有大工业用的，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原料呢？全是废旧公司从市区回收的废旧锉刀。马桥公社还有三个大队弹簧厂，专门生产各种型号的弹簧，其原料也是用从废旧电缆中拆出来的铁丝加工而成的。

在调查中，我们粗粗估计了一下，利用大工业的下脚作原料的社队工业，在全郊区至少不下五百个。还有许多地方，利用当地的资源，办了不少就地取材的工业。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挥舞“整顿”的大棒，重搞“条条专政”，把农、轻、重的次序颠倒为重、轻、农，只要大工业，不要中小工业。在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产生了某些对社队工业实行“关门主义”或“不冷不热”的倾向，甚至明明有大量的边角废料，宁愿积压在仓库里而不愿或不敢供给社队工业。数以亿计的废旧机电设备，宁可当废钢铁回炉，也不肯提供给农村发展社队工业，以致有些专门负责修复电动机的社队工厂不得不停工转产。如果能扭转这种倾向，社队工业的原材料问题是大有希望的。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上海橡胶制品二厂生产马达上用的橡胶带，切下来的边角余料现在都当燃料烧掉，而缝纫机上用的那根牛皮机带却非常紧张；如果把橡胶制品二厂的边角废料利用起来，加点尼龙进去，就可以制成同样效果的缝纫机机带。这不是也可以发展一个社办工厂或几个队办工厂吗？

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的。我们相信，随着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这些潜力必将充分挖掘出来。郊区社队工业的发展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查，看到了社队工业所展示的前途，进一步坚定了大办社队工业的决心和信心。当然，我们的工作存在着很多缺点，许多问题认识得还不深刻，有的观点也可能存在着片面性。但是，我们还是鼓足勇气将自己在调查中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的看法谈出来，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我们深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的社队工业必将获得新的进一步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同志们，让我们大家都来做社队工业的促进派吧！

# 充分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

## ——谈谈支持社队工业的一点体会

中共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委员会书记 朱庆隆

在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局有关站、公司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逐步提高了支持社队办工业的自觉性。到一九七五年底，与我们建立产销关系的社队工厂有四百五十五户，收购产品八百四十种，收购总额一亿三千三百四十九万元，比一九七〇年增加将近五倍。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商业部门只要充分发挥能动作用，同样也能大力支持和促进社队工业的发展。

要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必须深刻认识发展社队工业的深远意义。起先，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发展社队工业是国家积累转移了，所有制倒退了，担心方向不对头。因此，对社队工业不放心、不热情。针对这些思想，我们引导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等论述，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这同时，局党委还组织了四十多人的调查组，对所有对口社队工厂一个个进行剖析，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如，奉贤县平安公社砂磙大队，一九七一年时十个生产队有七个年终依赖公社贷款分红。后来，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了漆刷厂，他们不仅当年归还了贷款，还购置了必要的农业机械，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穷队变成了富队。这些生动的事例使大家认识到，支持社队工业，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对缩小贫富差距，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重要意义。因此，对社队工业抱什么态度，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有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问题。于是，局党委于一九七三年初专门作出了一项支持社队工业发展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前进。

要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必须不断清除修正主义经营路线的流毒。在支持社队办工业的过程中，我们有些干部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表现出流通决定生产的错误观点。对此，我们抓了“三破三立”，破“以我为主”，立生产是基础的观点。五金站的同志起先认为，“社队工厂生产，计划我安排，原料我调拨，质量我把关，一切听我的”。这样，影响了社队工厂积极性的发挥。后来，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革命导师有关生产和流通辩证关系的论述，认识到国营商业与社队工业，在所有制关系上，要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在产销关系上，又要服务于生产，从而摆正了生产与流通的位置。他们采取了有效措施，成立了采购工作组，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通过质量普查、举办对比展览会等形式，热情

帮助社队工厂搞好生产。几年来,与他们挂钩的社队工厂有很大发展,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家发展到六十六家,收购产值增长了五百倍。破“得不偿失”,立为农服务的观点。土杂公司经营的草席,历来靠外地调入。原来他们认为,发展社队生产“费力大,要赔本,得不偿失”。后来,公司党委引导职工批判了“大利大干,无利不干”的修正主义经营路线,同时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了解到上海郊区有种草织席的传统和条件,于是他们采用商业贴补的办法,大力扶植社队发展草席生产。目前,已在二十三个公社办了一百五十个草席厂,年产四十五万条,占本市销售量的一半。最近,他们又帮助草席厂设计成功了织席机,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破“商业被动”,立大有作为的观点。五金交电公司经营的马铁零件,是一种连接管道的配件,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量急剧增加,市场供不应求。由于原来的生产工厂已部分改产,需要在社队工业发展生产。但有的同志却认为,我们商业部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原料,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联系实际,批判商业被动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无所作为的懦夫懒汉世界观,提高了路线觉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大力支持社队工厂生产马铁零件。没有厂房,他们与贫下中农一起,利用旧房子,修理改造;缺乏设备,采用聚零为整的方法,请有关工厂加工零部件,自己动手配套安装;原料困难,主动向领导部门汇报,还想方设法“找米下锅”。他们还组织社队工厂的贫下中农到使用马铁零件的金山石化总厂参观,使社队工厂的贫下中农深切体会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进一步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马铁零件的产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一九七五年全市市场供应的马铁零件,百分之六十四是由社队工厂生产的。金山石化总厂第一期工程所需的一百余万只马铁零件,也基本上都是这些厂生产的。

要发挥商业的能动作用,必须支持社队工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单纯地发展几个工厂,更重要的是要帮助社队工业抵制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有的社队工厂存在“利润挂帅”的倾向,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学习批判,共同提高觉悟;有的社队工厂务工社员的分配水平远远超过了务农社员,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讨论为什么要办社队工业,进一步明确目的意义,缩小分配差距;有的社队工厂贪大求洋,我们就组织他们到勤俭办厂的单位参观学习。前几年,郊县服装加工业迅速发展,有些社队工厂收料不验收,交接无手续,差错事故多。服装鞋帽公司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出发,帮助他们建立了简单易行的管理制度,深受社队工厂的欢迎。

支持社队工业发展,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但是,从我们局党委来说,对这项工作还抓得不够有力,重视大工厂、轻视社队工业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解决,对支持社队办工业中的一些问题也解决得不够及时,措施不够有力。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与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进一步发挥商业部门的主观能动作用,会同工业部门进行商品排队,按照“支农要支穷”的原则,再有计划地发展一批社队工业,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工业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使商业工作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 采购人员说潜力

——记上海化学试剂站采购员李定安的一次谈话

“行，我就来说说发展社队工业的潜力。现在，有些人一听说要支援社队工业，就强调缺乏原材料呀，机器设备没有呀，真是困难一大堆，好象发展社队工业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可不那么看。

“我搞了十多年化学试剂的采购工作。化学试剂应用的范围可广泛了，科学实验、医疗化验、产品检验，都需要它。过去我们有些同志也认为，生产化学试剂产品要求高，生产过程复杂，我们手中没有原料，没有设备，发展社队厂是无能为力的。可后来，大家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积极行动起来，出点子，想办法，找门路，竟发展了一大批社队工厂。一九七〇年以来，我站已同郊区十八个社队工厂建立了产销关系，收购的品种已达八十八种，产值达一百七十七万元。

“你问发展这些社队工厂的原材料从哪里来吗？在城市，在农村，到处都有呀。噢，你可别认为这太玄了，一点也不。我举两个例子给你听。我们负责采购供应的有个试剂叫硫酸镁，市场供应一直十分紧张。后来，我们打听到上海铍粒厂在制造笔尖的铍粒磨光工艺中，有大量的废水流弃，造成严重污染，厂方感到很难处理。这废液中含有硫酸和氧化镁，提炼出来就可制成硫酸镁。我们就建议厂里抽出两个同志，用面盆将废水收集起来，提供给金山县涑泾化工厂作为生产硫酸镁的原料。这不就为社队工厂提供了原料了吗？上海铍粒厂的三废问题也从此得到了解决。真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呢。从大工业的下脚——‘三废’中找原料，光是这个潜力就大得很。有些人就是不注意从这方面动脑筋。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城市排出的废气、废液、废渣、废料也就会越来越多，这几个‘废’其实并不都是废物。现在就还有好多宝贝没有利用起来呢。据我所知，上海农药厂生产敌百虫时就有一种废液排出来，其中含有一种气体氯甲烷的物质。如果发展一个社队工厂，就可用它生产彩色胶卷上需要的成色剂二氯甲烷。又比如味精厂排除出来的黑废液，现在卖给农民当肥料。可是其中有许多氨基酸没提炼出来，如酪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都是医疗方面制造药品的必需品。每吨废液估计可回收五千元左右的有用物资。经过回收后的废液再卖给农民当肥料，反而能增加肥效……关于这方面的潜力真是太多了，你叫我说也说不完哪！”

“噢，你不提，我倒忘了，我们确实有一种试剂是利用农村猪棚墙壁上的一种物质生产的。这种试剂叫硝酸钾，市场供应很紧张。后来，不知是哪个采购员了解到农村猪棚的墙壁上会不断出现一层白膜，就是硝，这是生产硝酸钾的宝贵原料。我们就在养猪比较好的松江县泖港公社发展了一个社办工厂，就地取材，专门生产这个产品。说来也奇怪，我

们竟在猪棚里也挖到了发展社队工业的原材料。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农村也到处存在着发展社队工业的潜力。我们已经有好多试剂是利用农村的一些自然资源安排社队工厂生产的。比如，金山县亭新公社化工厂生产的一种分析有机胺的试剂叫糠醛，就是他们利用农村中的稻糠和野生植物苍耳子生产的。事实证明，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发展社队工业中，原材料问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你问得好，为什么有些干部看不到这些潜力呢？我看有两个原因。有的干部本身对发展社队工业思想不通，怕发展社队工业后本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可获得的利润被流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去了，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有的怕社队工厂生产的试剂不保险。有了这些思想，畏首畏尾，怕这怕那，怎么会看到发展社队工业的潜力呢？有种试剂叫丁酮，是电子工业必需使用的清洗剂，也是生产无麻醉新止痛药的重要原料。全国用量很大，年需要量约一百吨，过去一直靠外汇进口。我们采购员想想很心痛，决心自力更生生产这种产品。一九六九年，我们向石油化学研究所领导反映，要求他们帮助搞一个提炼这种试剂的工艺。石化所的职工打破洋框框，花了两年多时间，进行了五百多次试验，最后摸索出了提炼这种试剂的工艺，我们就想安排金山县一个镇办厂生产。可是，我站领导上担心这样做会产生‘利润转移’，想叫大工业生产。可是大工业的工厂生产任务很紧张，安排不下，结果这个项目就被打入了冷宫，丁酮至今还靠进口。什么‘利润转移’！对这个问题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既然怕利润转移到集体所有制中去，为什么就不怕利润转移到外国资本家的口袋里去？”

“依我看，有的人就是不相信群众，不肯认真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不到农村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发展社队工业的积极性，看不到我们采购人员支持社队工业的积极性。我们采购人员天天在外面跑，知道的发展社队工业的线索可多啦，而有的干部坐在办公室里，看计划拨料，当然眼面前看到的都是一大堆困难。其实啊，只要这些干部到我们采购员这里来听一听，走一走，原材料就站在他们面前了！正如鲁迅所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不往下面跑，又怕前怕后不敢闯，自己不搞还反对别人搞，我看这里就有个思想和路线问题。”

“我只能站在化剂采购工作的角度来谈发展社队工业的潜力，我想，其他各行各业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 记一次发言

这是一位老干部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议题是，如何进一步发展上海郊区的社队工业。各条战线的同志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有的谈了发展社队工业的深远意义，有的摆了本单位本系统进一步支持

社队工业的潜力,有的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发展社队工业中的影响。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当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位革命老干部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接过话筒讲了这么一席话——

听了这么多同志的发言,对我又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和帮助。我老早就想发言了,可是讲什么呢?想了好久,觉得还是讲讲自己在社队工业问题上犯错误的教训,这也许对大家有点益处。

关于社队工业的问题,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讲了。毛主席说:“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我是当时就知道的。但是,知道了没有用,因为自己的世界观还没有转变,所以,到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当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大喊大叫社队工业“办早了”,“办糟了”,从而大砍大杀社队工业的时候,我也在里面占了一脚。当时,我们确实也抓到了社队工业的几条“小辫子”——某些缺点方面的东西。其实那都是支流,都是表面现象,而根本不是本质的东西;什么“和大工业争原料”啦,什么“助长了投机倒把”啦,什么“亏损太多”啦,等等。那时,我跟在刘少奇、邓小平后面,在华东几个省也着实砍了好几个社队企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有些地方被砍得伤了元气,很长时期恢复不起来。我们这些人真是比资本家还厉害呀!有哪一个资本家能够一刀砍下去就搞垮好几万个社会主义企业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广大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反复地帮助教育我,我还不服气呢,认为我哪有什么错呀,社队工业的问题是不少嘛。革命群众要我交代砍掉了多少,我交代不出来。后来在五·七干校生活了几年,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认识才有所提高。社队工业是个新生事物。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一诞生就是完美无缺的,在它诞生的时候,也就同时诞生了它的缺点,只有在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逐步地完善起来。不然,辩证法就中断了。所以,在社队工业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后,不是要去扼杀它,而是要满腔热情地去克服这些缺点,使它更快地茁壮成长起来。一个小孩刚出生时,总会带来不少污水,但我们总不该把小孩连同污水一起泼掉吧?!

社队工业的发展是大方向,是主流,这个原则必须肯定。社队工业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有些问题,在一些国营企业不也照样存在吗?如果因为社队工业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就要砍,那么,那些国营企业难道也要一刀砍掉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地帮助它解决这些问题,把它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而不是去打击它,扼杀它。我们要看到,发展社队工业是为了壮大和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发展社队工业,要怕的倒是可能再有人去砍社队工业,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扼杀社队工业的发展。

我就谈这么一点,因为今天的会议在这一方面对我触动最大。

这位发言的革命老干部是谁呢?他就是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现在正在从事计划工作的韩哲一同志。

## 充分认识吨位挂帅的危害性

上运三场党委书记 顾美修

上海工业玻璃五厂关于茶盘生产的一场争论中提出的产值挂帅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联系我场实际，就吨位挂帅问题谈一些体会。

我们运输行业，每天要同吨位打交道，弄得不好就会出现“早上派吨位，中午抓吨位，晚上算吨位”，整天围着吨位打转转，把“完成吨位”当作衡量生产好坏的唯一标准。去年，在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之下，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批判过的“吨位挂帅”的思想又冒了出来，什么“只要吨位上得去，政治就讲得响”，“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吨位干出来也是社会主义的”，等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作具体分析，只要吨位上去了就受表扬，上不去就吃批评。比如，我场有的车队，承担的业务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车站码头的干线运输，从毛竹木棍、锅碗瓢盆，到烟酒茶糖、生铁锰铁，都是批量小、装卸难；而有的车队承担的运输业务大部分都是吨量大、产量高的大批件，如黄砂、石子等，群众说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啃骨头，一个是吃肥肉”。从完成吨位指标来看，前者确实不及后者。而我们在评比时，对于吨位完成得较差的车队，既不是首先看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也不分析吨位上不去的具体原因，总是一味加以批评；而对于吨位上去了的车队，则又不管它其他方面如何，总是表扬。看起来批评和表扬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实际上正如工人群众批评的，是我们“头脑里只有吨位，没有路线”。

事实也证明，搞吨位挂帅，虽然有时生产也能搞上去，但路线错了，危害极大。

首先，搞吨位挂帅，就必然会忘记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不顾革命生产的需要，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有个时期，我场就出现了吨位高的抢着干，吨位低的慢慢来的现象。我场对口的南站干线业务，每天都有很多杂货要运，关系到工农业的全局，但由于我们一心抓吨位，在受理业务、安排计划时，批量大、好做的“肥肉”抢着揽，批量小、难啃的“骨头”一边揽，急需运的踢出门，不需运的找上门，结果造成干线物资积压运不出，有的运出了又不急需。有个轧石厂托运二百吨大石块，这个任务并不急，但因为吨位高，我们就来个“北京填鸭——硬塞”，一下运去二千斤。人家厂里根本堆不下，只好在厂门外堆了三里路长。照此下去，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就要起变化了。

搞吨位挂帅，还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使干群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领导压吨位，调度派吨位，工人也就成了吨位的奴隶。驾驶员和修理

工之间,也是前方超载,后方遭灾,互相责怪,情绪对立;兄弟场之间的关系,成了互相对立的竞争关系,吨位高的“抢篮球”,吨位低的“踢足球”,抢了吨位,丢了风格,什么相互支援,什么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统统都不要了。我们和客户的关系,也成了单纯的买卖关系。

资本主义相互关系代替了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生产力就必定会遭到破坏。从我们场来看,由于吨位挂帅,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超载超速行驶,损坏了设备,影响了生产。有个车队共有五十辆汽车,由于超载压车抢吨位,严重影响了车辆完好率,一次竟有十二辆车子停下来修理,不能投入生产。而且,吨位挂帅,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一泛滥,多报吨位、弄虚作假等各种怪事也都出来了。因此,许多事实证明,吨位挂帅,不仅危害革命,而且破坏生产。

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时深刻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吨位挂帅,正是邓小平鼓吹的“白猫、黑猫”论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其反动实质,就是不要党的基本路线,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分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照邓小平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去办,那就同解放前资本家那种“车轮一滚,钞票一捆,马达一响,黄金万两”的生意经毫无区别。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要把生产搞上去,就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推动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前进。

产值挂帅、吨位挂帅之类的修正主义货色,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还有市场,除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能不能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充分认识产值挂帅、吨位挂帅的危害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说不能搞吨位挂帅,但是总认为“吨位挂帅闹闹是臭的,吃吃还是香的”,“把吨位搞上去,说话就灵,腰板就硬,领导一表扬,名气就会响”。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对吨位挂帅总是批归批,干归干。这就告诉我们,批邓斗争,是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战役,我们不仅要坚持批,而且要联系实际深入批。只有这样,才能肃清流毒,端正路线,明确方向。

批邓斗争开展以来,我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弄清吨位挂帅的危害,自觉地注意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全厂上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在各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我场三〇六车队,今年以来转战南北,保重点,啃骨头,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成了全场有名的“游击队”。批邓斗争,促进了相互关系的改善,许多车队上下团结一致,千群并肩战斗。三〇三车队今年以来,在抽调十部车辆支援长途运输的情况下,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做到减车增产,安全节油,车辆完好。全场广大职工狠批吨位挂帅,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受理业务不管吨位大小,只要客户急需,保证及时送到,工人群众发扬了当家作主的精神,相互协作,大挖劳动潜力,“龙江”风格大发扬,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年上半年在减人减车的情况下,完成货运量三百九十五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点二。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的强大动力,我们场的实践不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吗?

# 从开展刀具修磨业务 看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

上海工具厂刀具修磨服务部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厂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社会主义工厂，只有不断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利润挂帅”、“产值挂帅”等一套修正主义黑货，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工厂和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目的的根本区别，坚持为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我们厂是生产车刀、铣刀、滚刀、锯片等各种金属切削刀具的，产品供应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厂只管生产刀具，从不搞刀具的修理刃磨，而且认为这是“历来如此，天经地义”的。但是，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我厂生产刀具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许多工厂为了节约刀具使用，便把用钝了的和损坏了的刀具大量拿到我们厂里来要求修磨。这种形势，迫使我们第一次打破了“历来如此”的老例，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六年初，开始成立了“修磨服务部”。“修磨服务部”是成立了，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那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脑子里转的还是“产值”“利润”那一套，认为修磨刀具花工多，收费少，不合算。以七百十毫米圆锯片为例，生产一片新的同修磨一片旧的相比较，劳动量消耗是十比一，产值却只有二十八比一。所以对修磨服务很被动。因为光从产值大小打主意，修磨服务部中只安排了两个工人应付门面；而且遇到生产任务繁重时，就干脆把修磨工作挤掉了。这样一来，收进待修的刀具就大量积压起来，仅圆锯片一项即多达四千片以上，大大拖了各厂生产的后腿。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通过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认识到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而决不能单纯追求产值、利润。修磨刀具，帮助用户节约使用刀具，对我们

一个厂来说,虽然花工多,收益少,但一把刀具顶几把用,既满足了使用单位生产上的需要,还帮助他们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国家节约了钢材。我们提高认识以后,就决心把修理刃磨刀具的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厂职工的支持下,土法上马,设计制造了一条圆锯片修磨线,效率提高五倍,很快就将积压的四千片圆锯片全部修磨好了。后来,我们又先后试制成功滚刀开口机、拉刀磨和万能刀具磨等专用刃磨修理设备,把修磨范围扩大至蜗轮滚刀、拉刀、插齿刀等精密度较高的特殊刀具。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共为各地工厂修磨各种刀具六十万件,热处理各种刀具一千多吨。

思想路线一端正,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的路子便越走越宽。我们在开展刀具修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有些生产技术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工厂,也千里迢迢把刀具送到我们厂里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修磨的刀具达不到要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帮助这些单位提高修磨技术,可不可以节约往返人力,并且使刀具及时修磨好,在生产上发挥作用吗?于是,在厂党委领导下,我们派出了有技术经验的工人到有关地区工厂传授操作经验,帮助他们掌握修磨技术。这样做,对我们厂来说,虽然不能增加什么产值、利润,反而要占用技术较好的劳动力,似乎是得不偿失;但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算帐,却是为国家建设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一九七〇年,上海各工厂为了节约用煤,开展了改造锅炉的群众运动。改造锅炉,普遍需要直径六十毫米以上的大钻头。当时,这种大钻头我们生产得不多,一时不能满足许多工厂的需要;而买到大钻头的工厂,因为大钻头在其他方面的用处不大,又往往在使用一次以后就积压起来,造成浪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想:能不能把生产数量有限的大钻头,采用出租的方式,既满足许多工厂的需要,又避免积压浪费呢?我们得到厂党委的支持,增设了大钻头出租业务,深受许多工厂的欢迎。由于大钻头出租的启发,以后我们又根据各行各业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需要,继续开办了各种特殊规格刀具的出租业务,品种规格达到一千多种。许多兄弟工厂说我们修磨服务部是他们的“后备刀具室”,这是大家对我们的热情鼓励和深切期望。我们一定要朝这个目标努力去做,把刀具修理刃磨的工作做得更好,用实际行动来粉碎邓小平之类走资派宣扬的“利润挂帅”、“产值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肃清它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影响。

## 更正

本刊第八期第31页第十一行起的两段内提到的“微波管”,均应为“波纹管”,“调速管”均应为“速调管”。

# 纪念鲁迅 学习鲁迅

## 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

石 一 歌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书信）这是鲁迅通过长期斗争总结出的一条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鲁迅告诫革命者：不但要注意迎面扑来的敌人，更要防备自己营垒中的“蛀虫”，把他们清除出去。

“蛀虫”，是一些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投机家。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不少人还窃取了相当高的领导职务，可是却专门进行破坏和捣乱，处处同正确路线对着干，企图使革命从根本上变质。这些人极擅长于造谣言、放暗箭、耍两面派之类“阴面战法”，“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周扬、田汉等“四条汉子”之流，就是这样的一批“蛀虫”。他们钻进了“左联”的领导机构，以党的化身自居，先是卖力地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搞冒险，搞宗派，搞分裂；后来又追随王明搞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鼓吹“国防文学”，私自解散“左联”，把领导权出卖给国民党。他们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视为推行错误路线的障碍，不惜化了装从背后进行攻击、诽谤、恐吓，无所不用其极。鲁迅严厉地痛斥了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并且一再表示，对于这类“蛀虫”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格外憎恶“蛀虫”，是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中，看清了他们所起的特殊的破坏作用，认识到他们对革命的危害特别严重。辛亥革命时，那些遗老遗少、假洋鬼子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纷纷钻到革命党内。有些革命党人对清王朝不愧为战士，但对这批“蛀虫”毫无提防，终于牺牲在他们的屠刀之下。第一次革命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大炮机枪，没有能阻挡住革命，但是，蒋介石的叛变，加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却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葬送了。这些历史教训表明，人们对明显的敌人比较容易看得清楚，而对“蛀虫”则往往缺乏警惕。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蛀虫”们钻进革命队伍打“挖心战”，能起到公开的敌人起不到的反动作用。如果让他们篡夺了领导权，使错误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就会导致革命失败。对此，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三闲集·论共大观》）

“内里蛀空”这四个字，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蛀虫”们的活动特点和危险性。许多“蛀虫”，特别是那些窃据了革命的领导职务的“蛀虫”，主要是通过改变革命的路线，把革命引向失败的。这在鲁迅所处的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如此。走资派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出现在党内，他们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在党内形成一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他们最本质的政治特征，就是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是隐藏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最凶恶、最危险的“蛀虫”。列宁说：“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苏联变修的教训，早已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课。当年，十四国干涉，白匪叛乱，希特勒的侵略，没有能扼杀无产阶级政权，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类党内走资派在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后，却通过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蛀空”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邓小平就是要踩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脚印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总纲”，否定党的纲领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内里蛀空”，变马列主义的党为修正主义的党，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用来骗人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不过是“蛀虫”身上的一层保护色罢了。

革命队伍中出现“蛀虫”，并非偶然，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革命的政党、革命的队伍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在革命洪流奔腾向前时，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但会混进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敌人有目的地派遣进来的特务、内奸，还会卷进一些出于各种原因到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的人。鲁迅在批判周扬之流时曾指出，这些“蛀虫”虽号称“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在革命过程中，“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照搬过来，“决不在大处着眼”。他们不但不肯认真改造自己，还要按照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改造党、改造革命队伍，这就势必变成“蛀虫”。有的人虽非破落户子弟，但“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向往剥削阶级的乐园，把参加革命看作入股，当作“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象人寿保险公司一般”，因此，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或是在革命遇到困难和挫折之时，他们就立即脚底抹油，临阵脱逃，甚至投入敌人怀抱。鲁迅深刻地指出：“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终极目的的不同”，集中表现着阶级利益、政治路线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的“终极目的”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这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所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的。他们中有的人连民主革命的这一关也没能过，有的人虽然在民主革命中与无产阶级同过一段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十月》后记）。邓小平就是这样。他带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参加了民主革命，一直拒绝改造思想，民主革命后从不想前进到反对革命，结果和工人农

民处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从“同路人”变成了走资派，变成了一条大“蛀虫”。

既然“蛀虫”同无产阶级根本对立，危害如此之大，革命者应该怎么办？鲁迅坚定而明确地回答：“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他法。”（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书信）尽管鲁迅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总是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去分析、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理论，揭露“蛀虫”们散布的谣言和诡辩，“投一光辉”，“使伏在大熏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鲁迅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认真地总结着和“蛀虫”作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蛀虫”们阴面战法的五花八门，让未来的革命者认清他们的“老谱”，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战斗一定会遇到阻力。正当鲁迅和“蛀虫”们作艰苦斗争的时候，敌人放出了烟幕，把这场斗争故意说成个人之间的争斗，并污蔑说，这是“内战”。

是的，这是“内战”，因为它是跟同一营垒里化了装的“战友”所进行的特殊斗争。但是，它的本质是一场殊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紧密地关系着革命的成败，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因此，它是两大对抗阶级两军对垒的一条重要战线，是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更尖锐化、深刻化的表现。从阶级本质上说，这哪里是“内战”，恰恰是“外战”！

“内战”论的出笼，是为了抹煞革命队伍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实质，掩饰“蛀虫”们的本来面目，在人们思想上制造混乱，以便他们能继续隐藏下来。鲁迅识破了这种阴谋，他说，这场斗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鲁迅有广阔的无产阶级革命胸怀，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即使曾经错误地反对过他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为革命而劳作，他也依然视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关心、爱护无微不至；如果在立场、路线上发生了对立，即使曾经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也毫不留情面。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不斗行吗？！他认为，如果说这是“内战”，革命者就决不应回避，相反，“必须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这里，正表现了鲁迅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

分清了“营垒”，清除掉“蛀虫”，是好事，不是坏事，革命队伍更加兴旺了，而不是削弱了。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致奥·倍倍尔》）因此，在这样的战斗面前，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总是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勇猛前进的坚强信念。他认为，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革命的发展并不是系在“蛀虫”——哪怕是成了“大人物”的“蛀虫”身上。清除了革命队伍里的隐患，防止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革命一定会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场斗争，将推动真正的革命者奋勇前进，并将不断地召唤和吸收着浩浩荡荡的新生革命力量投入伟大的斗争，所以，“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有些人对斗争感到厌烦和悲观，摇头叹气，“呜呼”不已，鲁迅指出这是由于或者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感到了末日来临的威胁；或者是“置身事外不辨是非”，没有投入革命旋涡，不了解革命辩证法的缘故。

鲁迅曾经预见到，清除“蛀虫”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革命的深入证实了鲁迅预见的正确性。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革命队伍内部还会不断出现新的“蛀虫”。我们必须牢记鲁迅的告诫，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我们坚信，通过清除“蛀虫”的斗争，我们的党会愈加坚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会愈加巩固，共产主义的光明灿烂的未来，会愈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 “怒向刀丛觅小诗”

## ——论鲁迅后期诗歌的战斗性

任 棣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曾运用过多种文学武器进行战斗。诗歌，也是他得心应手的一种战斗武器。

鲁迅的诗，数量并不很多，但创作实践却比杂文早。和他的杂文一样，随着中国革命和他思想的发展，他的诗也是愈到后期愈益焕发出夺目的战斗光芒，不论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一批青年革命作家，并下令通缉鲁迅。鲁迅在离家避难中曾写下了一首七律：

惯于长夜过春时，孀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怒向刀丛觅小诗”，这句诗，可以概括鲁迅全部诗歌特别是后期诗歌的创作过程和战斗风格。鲁迅的诗，正是面对着各种敌人的刀丛枪林，出色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夜气如磐而又风雷激荡的时代，形象地纪录了二、三十年代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把几十首诗连贯起来，可以当作现代中国革命的史诗来读。

我们经常可以从鲁迅的诗歌中读到这类对偶的句子：“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无题》）；“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二十二年元旦》）；“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无题》）……一方面是骄奢淫逸、暴虐无忌，一方面是痛苦不堪、备受摧残。鲁迅把春风得意的“几家”和冷寂悲凉的“万籁”，把把占山巢的“将军”和惨遭残杀的“下民”，把凶焰蔽空的“飞将”和流离失所的“逸民”，进行了强烈的对照，从而深刻地展示了旧中国极其尖锐的阶级对立，揭露了反动派对人民群众的残酷迫害和镇压。毛主席说过：“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

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鲁迅后期的诗歌，正是符合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原则。既然“刀丛”并非仅仅是指个人的险恶境遇，而是对整个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反革命专政的形象概括，那么，从中“觅”出来的诗，当然就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战斗力。

鲁迅对手持屠刀的敌人无比憎恨，对反动派的凶恶和顽固有深刻的认识。他的诗歌中渗透着同阶级敌人进行长期斗争的宝贵经验。一九三〇年九月，鲁迅给一位当医生的亲戚题了一首诗：

杀人有将，救人为医。  
杀了大半，救其子遗。  
小补之哉，乌乎噫嘻！

这首诗，短短二十四个字，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血腥屠杀的滔天罪行，而且通过“杀人”和“救人”的对比，启示人们正确认识解放中国的根本道路。行医救人，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不彻底推翻反动政权，救治的人仍不免被反动派杀害。我们知道，鲁迅早年曾去日本学医，希望用医学救中国；严酷的现实打碎了这种幻想，他于是弃医从文，以期用文艺唤起人民的觉悟。后来，由于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鲁迅懂得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中国解放。他无情地批判了什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航空救国”之类唯心主义的奇谈怪论，奋不顾身地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这首诗，凝聚着他在求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的深刻体会。

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在不断变化，因此，鲁迅的诗歌也就不断“因时而作，有感而发”，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派系斗争，广州另行组织了“国民政府”，许多反动头子纷纷离开南京。而南京政府却依然在残暴地屠杀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六月，鲁迅就写了《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讥讽了反动派“聚义群雄又远游”的分崩离析状态，揭露了他们“雨花台边埋断戟”的无耻罪行，同时又指出，“石头城上月如钩”，他们的命运就如一钩即将沉没的残月一般岌岌可危了。又如，这年年底，国民党召开“四全代表大会”时去谒中山陵，鲁迅立即写了一首《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强盗的本质，尔虞我诈的丑剧，揭露殆尽。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正因为鲁迅一直以冷峻的眼光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又能把他们变化莫测的活动集中起来，画出一幅典型的图像：“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阖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寥寥数句，足以概括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反动头子的丑恶形象。

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国民党反动派纷纷准备投降的时候，鲁迅的诗歌中又立即出现了反侵略、反投降的内容。“雷霆飞燹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鸱。”（《题三义塔》）他是多

么愤怒地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蹂躏中国土地的血腥暴行！在这凶恶的侵略者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在干什么？“寂寞古城在，仓皇古董迁”（《学生和玉佛》）；“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吊大学生》）；“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亥年残秋偶作》）。也就是说，在卷财奔逃，在寻欢作乐！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后的同年，鲁迅以悲愤的心情作了一首《所闻》，写一个父母都被日本侵略军的炮弹杀害的女孩子被迫沦落到一家豪门侍宴。吸血鬼们不仅置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依然花天酒地，而且还不许这个女孩子流露出悲痛来。这首只有二十余字的七绝，却揭露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双重对立面，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具有很大的概括力。

鲁迅诗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真相，而且还揭示了这种矛盾的发展趋向。也就是说，他在诗作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评判着矛盾双方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用共产主义的光辉理想赋予诗歌以蓬勃的生命力。

请读读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些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但他是多么坚定地相信：冰封的大地必将开放出美丽的花朵，烈士的鲜血会催发出更多的革命新苗，万籁沉寂中一定会炸响震耳的惊雷！相反，那些反革命的“英雄”、“谋夫”们只能是鼓噪于黄昏的乌鸦，发出一阵阵绝望的悲鸣。革命的力量当时虽然弱小并备受摧残，但他们是新生的、向上的，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着未来，因而是不可战胜的；反动势力尽管猖獗一时，貌似强大，但他们是腐朽的、没落的，最后必然灭亡。鲁迅用诗的语言一再表达出来的这条历史规律，现在已经、而且将继续被事实所证实。

对历史规律的洞悉，使鲁迅充满革命乐观主义，这也给他的诗增加了很多深远的意境和明亮的色调。上面引过的那首抨击日本侵略者的七律《题三义塔》，格调悲愤苍凉，但鲁迅预见到，中日两国人民总有拆除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而世代友好下去的一天的，因此最后两句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意境一转为乐观而深远了。鲁迅的诗中一旦提到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更是一变为愉悦诚挚的笔调。他写过一首瑰丽多采的《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这首诗是一九三一年春当他听到工农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而使红色根据地更加巩固的消息时写下的。美丽的想象，巧妙的象征，崭新的意境，充溢着鲁迅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景仰之情。

正因为有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鲁迅信心百倍地看到了革命的广阔前途，更加坚韧不拔地进行战斗。他不仅要求自己在凛凛“秋肃”中“敢遣春温上笔端”（《亥年残秋偶作》），更积极地宣传火热的革命真理，而且还“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赠画师》），要更多的人去表现和创造红色革命根据地那个山花烂漫、春意盎然的新世界。

这些诗歌与当时社会上不少纯粹揭露黑暗的作品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那些诗，当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就象鲁迅指出的，“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没有温煦的理想之光照耀着它，生命力很脆弱。毛主席早就批评过：“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没有找到光明，对黑暗的批判不可能真正彻底；无法指出前途，对“刀丛”的暴露和鞭挞也不可能真正有力。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曾写过一首《哀范君》的诗，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没有找到光明，因此，诗歌在出色地勾画反动复辟派丑恶嘴脸的同时，还流露了“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等较为消极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的诗歌中已找不到一丝一毫了。由于有了坚定的信仰和正确的武器，他在揭露敌人的同时又赞美了革命，歌颂了人民，宣传了革命的理想，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这些诗冷峻而热烈，庄重而奔放，深切而豪迈，批判的锋芒辉映着理想的火花，在以往直至今天的革命历程中鼓舞和教育了千百万革命者，成了激励人们前进的号角。

总之，“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诗歌作者是这样，诗歌本身也是这样。鲁迅以他的创作实践证明：要创作出富有生命力的战斗诗篇，革命的诗歌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刻苦改造思想，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写诗是要有感情的，而感情又总是以一定阶级的世界观为基础的。鲁迅正是通过学习和长期的现实体察，深深地懂得了敌人和人民谁代表着光明，谁代表着黑暗，谁有着广阔的前途，谁正在走向死亡，因此就产生了强烈的爱憎，并把这种感情熔铸到了诗句中。他在一首著名的七律《自嘲》中写道：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毛主席曾对这首诗中的两句作了精辟的分析：“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

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这种爱憎分明的革命人生观，是他诗歌的灵魂，是他诗歌全部战斗力的源泉。诗如其人。

在反革命文化“围剿”最严重的时刻，鲁迅在给一个被国民党残杀的“朋辈”的遗诗作序时曾经说过：“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所说的“属于别一世界”，其实就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属于广大革命人民。正因为这样，鲁迅的这些光辉诗篇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而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今天，我们与鲁迅所处的环境已完全不同了，但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黑暗的深渊。面对着党内资产阶级猖狂的翻案活动和罪恶的复辟阴谋，我们的诗歌作者能不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冲上斗争的火线吗？斗争愈激烈，革命诗歌愈有用武之地，愈有必要也愈有条件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诗歌永远是战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怒向刀丛觅小诗”，仍然是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

---

（上接 55 页）

了剥削制度以后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在正确路线引导之下，干群关系更是焕发出共产主义的光彩。请看在唐山、丰南地区抗震救灾的斗争中，涌现了多少这样的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干部。他们临危不惧，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哪里最危险，那里就有他们战斗的足迹。他们公而忘私，面临着灾害的袭击，首先想到的是群众，而不是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一杯水、一块干粮、一件衣服，总是首先送到群众的手中。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的战歌。鲁迅借古代故事所抒写的理想，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普遍地成为现实。在这样的人们面前，山可移，海可填，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战胜，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鲁迅写离，还是为了投一光辉，照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丑恶嘴脸。《理水》中的那帮“学者”和“大员”们，真是既狂妄又愚蠢，既可恨又可笑。他们都反对离，甚至根本否认离的存在。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同人民群众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之中，因而必然是一伙主观唯心主义的瞎子，必然会根本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先进思想。今天那个邓小平不也胡说什么雷锋“不在了”吗？但是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光辉之下，他们这伙党内资产阶级，只能同《理水》中遭到“乡下人”严正批驳的“学者”一样，露出一副卑鄙龌龊的可怜相。

胜利永远属于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与群众战斗在一起的人们！

# 读《理水》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海 钟

在英雄的唐山、丰南地区广大军民取得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际，我们不由想起了四十多年前鲁迅的一篇小说——《理水》。

大禹治水，是一个反映上古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群众同一次特大洪水作斗争的古老的传说。禹，虽然后来的封建史家给加上了“圣人”、“贤君”之类的阔头衔，还给他起了一个颇有点神秘色彩的名字——“文命”，但其实不过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是远远不如后来的那些大官老爷们威风 and 神气的。这个当头头的，并不见得可以比群众多享受一些什么，逢到自然灾害，还要头头带头，艰苦奋斗，“身执耒耜以为民先”（《韩非子·五蠹》），辛苦得连腿上的毛都磨得光光的了。正是根据这些记载，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禹的形象：“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在一次会议上，他这样地阐述了自己的治水主张：

“……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象铁铸的一样。

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禹的形象上，无疑是寄托着自己的希望。鲁迅在小说中告诉我们，禹之成为治水的英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神力，更不是有什么天兵天将的帮助，他不过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正因为普通，所以才伟大。他立足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从群众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才领导群众取得了抗击洪水的胜利。鲁迅曾经由衷地表述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热爱：“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尊敬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鲁迅自己不也就是这样做的么？

鲁迅选择原始时代的禹来抒写自己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国家与革命》）自然，这种“回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形的上升和发展。如果说，在几千年前的原始时代，头头和群众曾经血肉相连，患难与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那么，在推翻

（下转 54 页）

#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 亲家，还是冤家？

——评苏修短篇小说《父亲》

薛毅

不是冤家不聚头，安德烈与瓦利亚好上啦！

原来，安德烈爱瓦利亚，是因为“姑娘很漂亮”：“挺直鼻子”，“浅蓝色的大眼睛”，“白净光滑的皮肤”，还有“淡色长发”，真称得上是一件妙手天成的艺术品呢。

至于瓦利亚爱安德烈，是因为——哎，少女的心思怎么好随便对人说呢！我们只知道安德烈的父亲是总工程师，母亲是商店经理，其他自然就不便多打听了。

既然情投意合，这盅喜酒看来是喝定了。不过，双方家长还没有碰过头呢。照惯例，“应当由男方的父母去拜访女方的父亲”，但瓦利亚的父亲柯甫利金只不过是个采煤工，于是总工程师普罗斯库林决定破除旧习惯、旧风俗，他通知，不，是邀请柯甫利金上他家去。

在今日苏联，总工程师请工人上自己家作客，可真是件稀罕的事儿。普罗斯库林不耻屈尊，那是很了不起的。柯甫利金父女也赶紧穿礼服，买礼品，着实忙碌了一番。可是，采煤工父女还没踏上总工程师家的台阶，就“迎面冲来一只颌毛直竖、目露凶光的大狗”，这可真有点惊心动魄。然而，这是个误会。安德烈向未来的丈人解释说：“它不是对您叫，它是欢迎您，它高兴得发疯了。”这真是隆重得有点特殊的礼遇啊。

普罗斯库林夫妇在走廊里欢迎父女俩。到底不愧是总工程师和经理，他们就好比狗镇静得多。岂止是镇静，“普罗斯库林很阴郁，脸上无精打彩。他的虚胖的妻子的眼睛里凝滞着期待和恐惧”。而柯甫利金呢？他的心都“由于害怕而变冷了”。亲家们就这样在声震屋宇的犬吠声中开始了历史性的会见。

柯甫利金来到总工程师富丽堂皇的家，真有点象刘姥姥跑进了大观园。进屋前，他把鞋底在小花地毯上擦了又擦；进屋后，他更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吃东西不是，不吃东西也不是，“万一不合规矩呢？”何况女儿还时常在一旁用目光“警告”他不能失规矩。那么到底有没有失规矩呢？天晓得。柯甫利金抱着“友好地、象亲戚那样地交谈”的愿望，毕恭毕敬地送上了最大的一盒糖果作礼品，未来的亲家太太却“看也不看”。柯甫利金客客气

气地谢绝了吃晚饭，却看到亲家太太“把嘴唇一瘪”，不由害怕起来。他赶紧同意喝点酒，又听见亲家太太长叹一声：“有些人喝酒喝得既多又粗野，这真令人惊奇。”正当柯甫利金被这个头等重大的规矩问题弄得左右为难、手足无措的时候，普罗斯库林太太终于点明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结婚的话，人家会怎么说呢？您考虑过吗？对您来说，这很好，很荣耀，而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这儿大家都知道，有地位，不是下等人，可是，忽然和您攀亲了！……”

结论是很明白的：门不当户不对，怎么能攀亲家。

柯甫利金听到这话，感到“一阵热浪冲进他的头脑”。其实，又何必激动呢？总工程师和工人，在今日之苏联，早已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采煤工每天干得“疲惫不堪”，而总工程师却是“惬意朦胧地”坐在办公室里；柯甫利金只能供女儿读到八年级，而安德烈却在准备进从事尖端科学工作的研究班呢。从柯甫利金一遇上坐下“膝盖和头就一样平”的沙发，便惶惶不安的窘相，也不难推知在他自己家里大概有些什么；而总工程师的颇具匠心的、坐落在花园深处的房子，则更足以显示他的威风。尽管总工程师以前当过推煤车工人，也是属于下等人之列，可一旦平步青云，身居要职，自然再也不会把下等人放在眼里了。这种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对立，就是当今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下等人要同上等人攀亲家，岂非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结婚必须门当户对，这并不是总工程师太太的新发明。奴隶社会里，贵族须得娶贵族。当然他也可占有漂亮的女奴，但从女奴肚里出来的儿子决不能算贵族。不过又因有贵族血统，等级也须得高于母亲，称为自由民。在封建社会，更是规定了一系列只有专家才能搞得清的规章制度，以保证下等人的血液不致流进上等人的血管里。那时舞台上虽常演穷秀才与大家小姐私订终身的故事，但穷秀才大抵是落难公子，血统本来高贵，后来又中了状元，小姐便当上了一品夫人，比在娘家时还要阔气，自始至终都严格遵循着门当户对的原则。在商品交换原则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手续大大简化，不必翻家谱、查十八代祖宗是否做官。只要等价交换就行了。但这同样是一种门当户对。只要有钱，年逾六十的老寡妇可以嫁给三十来岁的青年男子；行将就木的老头也可以娶个二八女郎。……

对今日苏联的商店经理普罗斯库林太太来说，这种生意经是不言而喻的，但柯甫利金却好象不懂这一点，他异想天开地建议说，既然两个青年人有了爱情，“就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吧。这可激怒了普罗斯库林太太：

“什么爱情？”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突然尖声喊道。“这一切都是胡闹！……”

谁“胡闹”？瓦利亚吗？不，普罗斯库林太太认为“她是很好的”，对于“姑娘很漂亮”这点，普罗斯库林太太甚至很欣赏。买牲口得看牙齿，娶儿媳当然要漂亮的。而美貌的瓦利亚一眼就选中了总工程师的儿子，正说明她“很严肃认真”，充分估计并发挥了美貌的价值。这可不是普罗斯库林太太的独特见解，而是今日苏联在婚姻问题上的统治思想。既然

这个社会早已把一切变成了商品，那么美貌也总得换得什么相称的东西。当上了总工程师和商店经理的儿媳妇，那么什么瑞士手表、法国香水、意大利皮鞋，乃至蒙古的牛肉、保加利亚的大白菜，是都会自动跑来的。对这种正当生意，普罗斯库林太太当然“丝毫也不反对”，包括瓦利亚讨嫌自己的采煤工父亲，对他“怒目圆睁”在内。不过，我们不必过多地去责备瓦利亚和今日苏联的姑娘们。有些苏修作者对她们颇有微词，是重弹“女人是祸水”的老调，将灾难和不幸的罪责一古脑儿推在她们身上。其实，她们的思想还不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叛徒们才是真正的元凶！

既然瓦利亚没胡闹，那么是安德烈胡闹吗？是的。从眼下看，郎财女貌，这笔交易马马虎虎还算公平，但从长远利益上看，安德烈可就大大吃亏了，讨个采煤工的女儿，那可要影响“前程”的呀。普罗斯库林太太已经替儿子考虑好了：他必须先进研究班，毕业后便可成为更“上等”的人上人，这时再设法去给有权势的譬如部长之类人家做东床，登龙而乘龙，乘龙后更登龙。这种目光不能说不远大。可是安德烈却被瓦利亚迷得神魂颠倒，自作主张地要结婚，岂不气煞人也么哥。当然，部长的女儿是否看得起厂矿总工程师的儿子还是个问题，但总工程师的儿子与采煤工女儿结婚，吃亏却是明明白白的。

在一系列暗示、说服、哀求、嘲骂的袭击下，柯甫利金终于答应不高攀这门亲家。普罗斯库林太太立即兴奋地对他宣布说：普罗斯库林“将提拔您当班长”。她是遵循商业道德的，缔结婚约是买卖，解除婚约也是买卖。既然柯甫利金作了让步，她决不能让他白吃亏。

这一幕戏，在今日之苏联并不稀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工人本来就是冤家，自然不可能成为亲家。小说至此似乎也可结束了。但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将高潮推向更高潮：总工程师被老婆的话气得发昏，心脏病发作，他不但同意两个青年人结婚，而且还打算把安德烈送到柯甫利金家去做招女婿。看来，作者是很喜欢有个大团圆的结局的。

但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大团圆，冤家终究成了亲家，这写法本身，就很能告诉我们点问题：两个阶级尖锐对立，使得自命为上等人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点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有人就建议搞大团圆，调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婚姻问题是阶级关系中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那自然应该予以注意。可是作者越是宣扬大团圆，则越显出这种团圆在苏联的稀少，越显出这种结尾虽则光明，但实在虚假，徒然博人一笑而已。

不过，作者既已同意让他们结婚，我们也不必多嘴多舌了。希望读者们也暂时不要提起名列世界前茅的苏联离婚率数字，来刹这对新婚夫妻的风景。我们还是引恩格斯一段话后，就赶紧结束了本文吧：

“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附：

## 父 亲

作者 爱伦斯特·蒲晋

(载苏修《文学俄罗斯》1975年第45期)

疲惫不堪的采煤工柯甫利金无力地从淋浴室走出来。浴室里整个作业班还在哼哼地喊着，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用热的水流冲去身上的肮脏和疲劳。

柯甫利金坐到长椅上，满足地吸着了烟。

“柯甫利金！”一个女人的声音严厉地喊道，“总工程师等你，忘了？”

“我这就去。”柯甫利金的脸色阴郁起来，嘟哝地说。

他不慌不忙把烟吸完，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捺熄，然后站起来，对着镜子瞧瞧，用手掌抚摩乌黑的、粗硬的头发，把蓬乱的灰白的两鬓抚平，接着勉强地向总工程师办公室走去。

“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您叫我吗？”柯甫利金挤进门去。

总工程师普罗斯库林用两手捧着头，正在睡意朦胧地看着什么文件。他抬起眼睛，不解地瞧着柯甫利金，但是他认出他以后，不自然地现出了笑容：

“啊，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普罗斯库林欠一欠身子。“进来，坐。嗯，有什么新闻吗？”

“我们干活，有啥新闻呢！”

“倒也是……我是为了这件事，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一切迹象都说明，我和你很快就要攀亲了。”普罗斯库林萎靡地、勉强地用两片嘴唇做出一种笑容。“变成亲家、干亲家，或者就象那里讲的……”

“好象是这样。”柯甫利金叹口气，低下了头。

“嗯，”普罗斯库林也叹口气。“说实在，我就是为这件事叫你来的，我妻子想和你认识认识。”

柯甫利金沉默不语，仔细地察看粗大的、突出的指甲。

“我知道，”普罗斯库林踌躇地说。“照例应当由男方的父母去拜访女方的父亲，可是你就给我妻子一点面子，今天上我们家里去，去坐一会，谈谈。七点钟来。讲妥了，好吗？”

“这件事，当然，是应该谈一谈，”柯甫利金点点头，并且站起来。“只不过这一切都不必要……您还是劝劝安德烈吧，啊？”

“不，为什么呢，”总工程师没有把握地反问道。“你的女儿很不错，不象我那个吊儿郎当的家伙。”

柯甫利金踌躇了一阵。

“我来。”

……晚上，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穿着自己节日穿的深蓝色波士顿呢上装，和女儿一起到普罗斯库林家去。虽然，女儿皱起了眉头，要求他穿别的上衣，她说，深蓝色太过时了，现在这种衣服已没人穿了。可是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不想蒙受耻辱，他坚持己见。他们走进食品店，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本来决定买一瓶“首都”牌酒，毕竟是去作客嘛。可是女儿怒目圆睁，以致柯甫利金离开了柜台。根据她的建

议，他买了最大的一盒糖果。现在，他一面走，一面对这盒糖果和自己过节般的外表感到害臊。

“最好别碰上熟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畏惧地想道。“大家一定会拿我开玩笑的。”他想到休息时全班拿他开玩笑的话，他们说：“彼得罗维奇，你要高攀领导做亲家？……你们缠啊，缠住普罗斯库林的儿子不放，看见了吗，他连城里的、大学里的姑娘都不想找了，他只要这个小性子爱生气的瓦利卡了，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轻轻地叹了口气。“对安德烈可以理解。”他小心地瞧着女儿，又一次地感到惊奇。她长得这样漂亮象谁呢？母亲长得马马虎虎，很一般。而至于自己，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意见是很确切的：一个很好的汉子，强壮，爱干活。不过脸蛋并不雅观，大鼻子，黑皮肤，蓬乱的眉毛，和女儿那挺直的鼻子、大眼睛的脸毫无共同之处。瓦尔瓦拉漫不经心地扎成粗粗的辫子的淡色长发也不象柯甫利金那粗硬的、竖起来的头发。而至于她的象群青颜料似的浅蓝色眼睛、白净光滑的皮肤，那就更说不上象他了。

……普罗斯库林一家的建造得颇具匠心的房子，坐落在一座茂盛的修剪得很整洁的花园深处。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和瓦利亚本来想从一条碎石路走到台阶上去，但是迎面冲来一只颈毛直竖、目露凶光的大狗，拖着一条低沉地咕咕作响的链条。瓦利亚紧靠在父亲身旁。

“这是符尔康，”她低声说道。“纯种狼狗，好品种，有执照。”

“它干吗这样凶？干吗白天也如此？”

“陌生人就是不让，不管什么时候。”

“那末它也不承认你是自己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冷笑一下。

“暂时还不承认。”女儿认真地回答说。

瓦利亚的未婚夫安德烈听到狗叫声走出来。他个子高大、宽肩膀、卷发，看来象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一样。

“啊，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他喊道，接着笑了起来，这一笑笑得很好，很诚挚。“请进。”

！他捉住发狂的狗，把它推到台阶下面去。

“您别害怕这畜生。它不是对您叫，它是欢迎您，它高兴得发疯了。”

安德烈握握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手，习惯地用嘴唇吻吻瓦利亚的脸颊。瓦利亚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并且很快地看了一下父亲。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装做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向台阶走去。

他认识安德烈。有一次安德烈到柯甫利金家里去，当瓦尔瓦拉在镜子跟前忙着梳妆打扮、准备到俱乐部去的时候，柯甫利金曾和他谈过话。他很强壮，很自信。由于这一点，他很使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喜欢。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穿过前室，鞋底在门口小花地毯上擦了几下。为了控制突然紧缩了的心，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便象过去第一次走进矿里的吊斗那样走了进去，走得很坚定，但内心却由于害怕而变冷了。

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和他的妻子在走廊里等他们。普罗斯库林很阴郁，脸上无精打彩。他的胖胖的妻子的眼睛里凝滞着期待和恐惧。

“你们好！”柯甫利金问好时嗓音嘶哑，不过，不知怎么因此显得响而刺耳。

普罗斯库林出人意料地用两片嘴唇开朗地笑了笑，然而他的眼睛里依然是阴郁的、有点儿抱歉似的。

“你好，你好，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他把手伸给柯甫利金，然后转身对妻子：“认识一下，这是瓦利亚的爸爸。”

普罗斯库林的妻子面带笑容，稍稍眯缝着眼睛。

“很高兴，而我们已经等得心焦了。”她唱一样地说并且自我介绍道：“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

“柯甫利金。”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握了一下她的柔软的手掌。“瓦利亚的爸爸。”他更明确地说明一下，再用眼睛指指女儿。

女儿温和地瞧着他们，勉强觉察得出，她微笑着。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把糖果递给普罗斯库林娜。

“这是给您的，”他说。“一点点小东西。”

“谢谢，”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看也不看，就把一盒糖果放在镜子前面的小桌子上，接着用一种大方的手势指点通向房间的门，“请。”

柯甫利金坐在一张指给他坐的沙发椅里，因此膝盖和头就一样平了。他本来想掏香烟，但是又不敢抽烟，因此两只手不知放在哪里才好，于是就呆着，当问到他天气，问到他身体时，他一面笑着，一面不恰当地、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道：“是的，是的，当然……好。”

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请他们吃晚饭，但是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慌忙谢绝。他认为，应当谢绝。普罗斯库林娜把嘴唇一瘪。

“或者，喝茶吧？”

“别忙，我不喝茶。”柯甫利金很快地答道，然后又感到害怕，也许，应当同意的吧，谢绝似乎不礼貌。

“哎，你们呀！”安德烈用手掌拍一下膝盖。“看来，这里没有半公升酒是搞不清楚的了。妈妈，给我们准备一些简单的、快一点的东西。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您不反对吧？”

柯甫利金不好意思再谢绝，便笑了一下，仿佛很高兴：

“可以。”

他的嗓音不知怎么令人感到太随便，而且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觉得他的笑容也是笨拙和阿谀奉承的，像个酒鬼那样。柯甫利金重新又皱起了眉头。

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叹了一口气，去摆桌子。

“瓦尔瓦拉，”柯甫利金象父亲应当做的那样厉声命令道。“干吗坐着？去帮帮主人的忙。”

女儿询问地望望女主人，并且准备站起来。

“坐着，坐着。”阿历甫季娜稍稍皱起眉说。

瓦利亚坐到位子上，变得冷淡、孤独。

当普罗斯库林娜摆桌子的时候，大家默默地坐着，认真地注视她忙碌地张罗，仿佛都在等待着，而且知道，等他们坐到桌上去喝酒时，他们会变得愉快和温暖：他们将不慌不忙地、友好地、象亲戚那样地交谈，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一切都将变得轻松和明朗。

“请。”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欣赏地看看餐桌。

“嗯，好极了！”老普罗斯库林坚定地站起来，请柯甫利金入席，他打开了一瓶白兰地以后，沉思着问道：

“也许，喝伏特加吧？”

“你问什么？”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两手一拍。“当然！让马克西姆……嗯……彼得罗维奇自在一些。”

她从柯甫利金鼻子底下拿走小酒杯。

“怎么给您这么小的酒杯！”她微微地、虚伪地笑道，在他面前摆上一只大肚子的大酒杯。“喝酒就得好好喝，对吗，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

“妈妈，”安德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我要求过你了嘛。”

柯甫利金对他瞟了一眼：

“没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定额。”

他们喝下了酒。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出于客气，用餐又挖了一点色拉，但是不敢吃。万一不合规矩呢。

“有些人喝酒喝得既多又粗野，这真令人惊奇。”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一面把鸡撕碎，一面叹口气说。“发工资的日子我们店里连路都不能走。您是知道的，我是店里的经理。”她转身向柯甫利金。

“您怎么不吃呢？不喜欢吗？”

“您说哪儿话，您说哪儿话！别费心……我吃的。”

“也许，再给您斟点伏特加吧？”

柯甫利金用手掩住酒杯：

“不，谢谢。我不能再喝了。”

“为什么呢？”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惊奇地说。“您别客气，我们还有呢，我们特地为您准备的。”

席上变得寂静无声。安德烈在椅子上坐立不安，痛苦地看了一下母亲。瓦尔瓦拉慢慢地把脸从餐盆上抬起来，以短暂的、研究的目光看一下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的脸，然后又低下眼睛。

“不，够了。”柯甫利金挪开酒杯。“我们已经为我们相识干过杯了。我们等着以后再喝吧。”他开始从鼻子里发出喘息声，他的蓬乱的眉毛挤向鼻梁。“应当谈谈正经事了，现在我们这样子有点不象样。大家默不作声，而且还叹气……瓦尔瓦拉，你出去。”

“为什么呢？”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脸上的红晕消失了，她圆圆的脸颊微微地抖动起来。“让她留在这儿好了。”

“出去。”柯甫利金不客气地重复说。“还有你，安德烈，也出去。我们，家长们之间应当谈谈。”

安德烈不乐意地站起来，轻轻一笑：

“上帝们开会，瓦利亚，我们走吧。”

瓦利亚很快地瞧了一下父亲，严肃、苛刻，仿佛有什么事想警告他似的。她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了出去。

普罗斯库林夫妇踌躇起来。

“就是说，是这么回事。”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搭救了他们。“我明白，你们对你们的安德烈娶我的瓦尔瓦拉不太高兴，请你们谈谈，你们对她有什么地方看不惯？我是她的父亲，我应当知道。”

“你想到哪儿去了，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普罗斯库林不好意思地说。

“请等一下，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柯甫利金用手掌象盾牌一样把他隔开。“让您的妻子讲吧，她是母亲。对姑娘，女人比我们男人看得更清楚。”

“好吧。”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恐惧地看着柯甫利金宽大的、满是老茧的手掌。

柯甫利金看到了她的目光所在，苦笑了一下，把手收了起来。

“好吧。”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重复说。“如果问题提得如此直截了当，那是应当回答的。我们丝毫不反对您的女儿。姑娘很漂亮，从各方面看，她都 very 严肃认真。可是请您理解我们，安德留沙是我们的独生子，他还年轻，考虑结婚还为时过早，对吗，费佳？”她转身向丈夫，而他用一只手掌撑着额头，用餐叉在盆子里划着。“安德留沙需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要知道，他在准备进研究班呢，可您知道吗，进研究班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柯甫利金嘟哝地说，“是科学呗。”

“科学，”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颤抖了一下，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正是如此。而瓦利亚，我不争辩，也许，她是很好的，可是她不会了解他，她会妨碍他。她只读到八年级，怎么能当他的助手，而且，总之……嗯，您怎么会不了解，他是我们的独生子。”她象做祷告似的把两手合在胸前。

“怎么不了解呢？事情很清楚，她和安德烈有爱情。”

“什么样的爱情？什么爱情？”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突然尖声喊道。“这一切都是胡闹！我们那个也是什么也听不进，我是怎么苦口婆心地说服他，恳求他的啊！我说，安德烈，你就可怜可怜母亲吧！一点用也没有，费佳，是这样吧？”

普罗斯库林没有抬起眼睛。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我请求您，”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哽咽着说。“请您做做女儿的工作，她会听您的。让她放了安德烈吧。哎，请您做做工作吧！”

柯甫利金象由于疼痛而皱起眉头，烦恼地瞧着普罗斯库林娜准备哭泣的脸。

“我，当然可以去谈谈，不过，或许就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别毁了他们的生活。”

“您说到哪儿去了，说到哪儿去了！”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急忙打断说。“这怎么能‘让他们生活在一起’？这种由于年轻冲动的爱恋是会过去的。而如果结婚的话，人家会怎么说呢？您考虑过吗？对您来说，这很好，很荣耀，而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这儿大家都知道，有地位，不是下等人，可是，忽然和您攀亲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洒上香水的、香气很浓的小手帕，把它紧紧地按在眼睛上，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普罗斯库林浑身发紧，他站起来，不乐意地抱住妻子的肩膀：

“噤，好了，好了。安静点。”

柯甫利金呆住了。猜到了的谜底象一阵热浪冲进他的头脑。

“是这……这样！”他出声地呼出气来。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觉得喉咙里干渴，他想喝点酒，但是他没有喝。他不想给普罗斯库林夫妇以挖苦他的口实。

“懂了，”他说，并且站了起来。“原来你们担心的是这个。我本来以为，你们不喜欢瓦利卡，而你们却是为了这个……哎，婆娘们才在集市上排队时嚼舌头，这可以理解，这是她们的事。她们是没有知识的人、粗鲁的人。对她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是有知识的人，生活过得很整洁、干净，很文明，我看到，整个书架上堆满了书，可也象这些婆娘……算了吧。真的，我本来也为这感到难为情，大家笑我说：柯甫利金想给女儿找个好主儿，要让自己的瓦利卡做工程师太太。尽管这些话是叫人受不了的，不过，又是荒谬可笑的，因此我也就不作声，让他们去胡扯。年轻人自己会决定的，他们看得更清楚……算了，我不把瓦利卡嫁给你们了！”

他向门口走去，倔强、庄重，笨拙地踩在松软的地毯的茸毛上。

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把手帕一下子从脸上拉开，轻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柯甫利金跟前。

“您一定要和女儿谈谈，”她恳求地瞧着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眼睛。“别骗人。我们将永远感谢您……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将提拔您当班长。”她出人意料地说道。

“阿历甫季娜！”普罗斯库林狂怒地吼叫起来。

柯甫利金嘲弄地瞧着他，而在一瞬间他又害怕起来，因为普罗斯库林的脸变得雪白了。

“瓦尔瓦拉！”他厉声喊道。“拿水来！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冷静些。”

安德烈一声不响地跑进来，他用很有信心的动作解开父亲的衬衣领子，松开领带。柯甫利金轻轻地、象抱小孩似的，把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软瘫了的身体托到手上，放到沙发上。这时，大家才听到一种不清楚的哭声：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一面在药柜里乱翻，一面因急速的、克制的号哭而哆嗦。

“在口袋里，在上衣口袋里。”柯甫利金闷声闷气地说。

瓦尔瓦拉就在旁边，她把药片递过去。

普罗斯库林用目光对她表示感谢，他把薄荷片放在舌头下面。他的脸露出孩子般的受了委屈的表情。

(下转 65 页)

## 当代最大的“米蛀虫”

楼乘震 吴安泰

“米蛀虫”是什么东西？生长在物价稳定、生活安宁的新社会的青少年们，大概会以为就是从米缸里爬出来的那种又白又肥、滴溜滚圆的小虫吧。其实，这“米蛀虫”不是虫，而是人，只要去看一看电影《闪闪的红星》，那个茂源米号的沈老板，便是一条货真价实的“米蛀虫”。

人而谓之虫，这倒并非是哪个人挖空思想出来的恶作剧。在旧社会，那些米店老板们，经营有方，生财有道，小则克扣斤两，掺假掺杂，大则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新谷登场，他们乘人之危，杀价收购；青黄不接，他们又趁火打劫，高价抛售。相比之下，沈老板还不能算是做大生意的。在旧上海，一些大米店老板，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起来，大搞粮食投机，在他们操纵之下，米价一天要涨几涨。老百姓恨透了，就赠他们个雅号，曰：“米蛀虫”。

在今天的新中国，除台湾省尚待解放外，“米蛀虫”早已绝了种了。但世界上却还大有虫在。有这样一则外电报道：

从苏联一九七四年对外贸易报告中得到的最新数字表明，俄国人以五亿三千三百三十七万六千卢布即每吨七十五点四卢布的价格进口了七百一十万吨谷物，以六亿二千二百七十五万五千卢布即每吨八十八点六卢布的价格出口了七百万吨谷物，从中获得纯利八千七百三十七万九千卢布，或者说将近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这笔生意可太合算了。每吨谷物，买价是七十五点四卢布，卖价是八十八点六卢布，差价达百分之十五。一进一出，就是一亿多美元进了克里姆林宫掌柜们的腰包。从克里姆林宫里爬出来的这条“米蛀虫”，不要说沈老板，就是旧上海那些大“米蛀虫”，也都只能瞠乎其后者。甚至白宫里的那条“米蛀虫”，在粮食争夺战中也已被克里姆林宫的“米蛀虫”狠狠地蛀了一口。流通不会创造价值。一亿美元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出来。世界市场的粮价腾贵，不少国家的饥民嗷嗷待哺，究其祸源，盖出自克里姆林宫。难怪西方报刊要向它奉上“资本主义的老大哥”的尊号了。

不仅于此，克里姆林宫里的这条世所罕见的“米蛀虫”极善于掩饰自己的本相，是决不肯当众赤条条地露出自己的白肚皮来的。它在自己的身上涂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保护

色,打着“援助”、“友谊”的旗号,利用自己手中的粮食,倒手转卖,从中渔利,企图把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小伙伴们以及其他一些什么“兄弟盟国”都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里。野心之大,手段之辣,简直想把整个地球都一起蛀空。因此,这条“米蛀虫”之可恶更是在其他米蛀虫之上。

其实,克里姆林宫的这条大“米蛀虫”,不仅蛀蚀和剥削着第三世界,蛀蚀和剥削着它所控制的东欧各国,同时也极其贪婪地蛀蚀和剥削着自己国家的人民。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积存了大量的余粮,现在却弄得粮食库存枯竭,连白面包的供应都成了问题,不得不连年向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好端端一个苏维埃国家,不就是让“米蛀虫”硬生生给蛀空了么!今天的苏联,已成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盘据的大蛀虫窠,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条“米蛀虫”不除掉,世界人民和苏联人民都是不得安宁的。

打倒当代最大的“米蛀虫”!

(上接63页)

“阿历甫季娜,”过了一会他说道。“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的嗓音稍稍强了一些。“安德烈,坐到这儿来,还有你,瓦利亚。这样……你们将住在马克西姆那里……要是他不反对的话。马克西姆,你不反对吧?”他问柯甫利金。

“那里。”柯甫利金不好意思起来。“也得问问母亲。”

阿历甫季娜·伊奥诺芙娜转过脸去,象块石头似的呆着。

“妈妈,”安德烈以热烈的嗓音说道。“我爱瓦利亚,我们必须在一起。”

柯甫利金示意叫他停止: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有话想说。

“阿历甫季娜,”普罗斯库林说。“当你还是推煤车工人的老婆时,你不是这样的,阿历甫季娜。那时,你当饱和器工人。你还记得这些吗,阿历甫季娜?那时,你喜欢我。你为我担忧。而现在我感到可怕,为你感到可怕……阿利卡。”

“我们走吧。”柯甫利金对女儿说。

“我送送你们,”安德烈脱口而出,可是瓦尔瓦拉制止他。

“不必了,今天不必了。”她以发白的嘴唇微微一笑。

柯甫利金和女儿默默地走着。宁静的黄昏向大地散发着温暖的朦胧的暮色。远处,在矿山的上空,星星闪烁着点点红光,从远处的俱乐部传来一阵阵忧郁的、动人的歌声。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小心地瞧着女儿。

“瞧,怎么回事,瓦尔瓦拉……”他咳嗽着,开始说道。

“我们别说话,爸爸。”瓦利亚请求道。“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我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柯甫利金集中注意力,等着她下面讲什么。

“什么样的呢?……”他问。

“古怪的!”瓦尔瓦拉笑起来了。

“到他们那儿去吧,”柯甫利金说。“那儿现在需要你。”

“好。”瓦尔瓦拉同意地点点头,用火热的手掌碰碰父亲的手。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拱起了背,突然感到自己老了,疲倦了,他长久地瞧着女儿的背影,她那白色的连衫裙象一块昏暗的斑点在暮色中闪烁。

(齐戈诗)



陆晓禾 周勇闯 宣玲玲

这是愚蠢的婚礼，这是高尚的婚礼；这是前途黯淡的婚礼，这是有远大理想的婚礼；它将留下悔恨与失望，它将充满光明与希望——这些出自不同人意见的激烈议论，是由于一次小小的山村婚礼而引起的。

这次婚礼是在江西省乐安县的金竹公社举行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那里有十对在当地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于同一天结了婚。婚礼是朴素的，新婚的男女青年中大多是刚撂下地里的活就来参加婚礼了，有的甚至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做。婚礼又是隆重的，金竹公社党委主持了这场集体婚礼，在客人中，有抚州地区革委会、乐安县委和当地贫下中农的代表，有从上海赶来的知识青年家长们，也还有着我们这些从远道闻风而来的陌生人。

婚礼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但更深刻的是它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它严峻地考验着这些青年人的家长、亲友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同时也更严峻地考验着这些青年人自己。结婚，这意味着决心扎根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学习大寨搞革命，进一步同旧传统、旧思想实行决裂。为了举行这次婚礼，这些青年人该是具有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呵！

婚礼开始了。

瞧，这一对对男女青年多么英俊而生气勃勃！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今后面临的道路也仍不可能是平坦而笔直的。但是，他们并不企望在枝柯蔽天、凉风拂拂的林荫道上散步，而是坚毅地期待着迎接披荆斩棘的战斗，在林莽中开辟着前人从未走过的前进道路。

亲爱的读者，你大概也很想知道这些青年人的故事吧？

## 一、一对新婚的青年人的故事

当主持婚礼的老谢宣布新婚夫妇代表讲话的时候，喧闹的会场顿时寂静下来了，许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楚宝湘的身上。楚宝湘是个朴实而稳重的女青年，个儿不太高，约摸二十六七岁，浅黑色的下颏微尖的脸庞，模样、装束都和当地的闺女差不离。她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一口流利的江西老俵口音，不慌不忙地叙述着他们夫妻俩的决心——

“今天我和小王的心情都很激动，这是因为我们已在社会主义的新山区扎下了根，将永远成为金竹山上的老俵啦！”

门旁窗外，象春蚕啃食桑叶似地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人们在悄悄地议论着：“这女仔叫什哩？”“我哩联村大队的小楚老师罗！”“她那个对象呢？”“就坐在她旁边，叫王营伟，是公社的知识青年综合场场长。小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那楚老师结了婚，该进综合场了，还能在你们大队教书吗？”“怎么不？小楚老师待我哩的小伢子可好呢，这好女仔可走不得。大队支书早说啦，结婚可以，走不行，哪怕拿崽徕来换女仔也不给。小楚老师也舍不得离开我哩呢，说是结婚后男女双方各住各的，反正都是干社会主义革命罗！”

楚宝湘在当地老俵心目中是个好女仔，王营伟可也是个棒小伙子。这个肤色黝黑的高个儿青年，浓眉下闪动着—双咄咄逼人的眸子，瘦削而强劲的身子里蕴藏着无穷尽的气力，灵活、敏捷得象头豹子。一九七二年他和民工上山修公路，有块几千斤重的大石头挡了道，十六个人没搬动，他看准了山石的位置和角度，一个人拿了把铁镐攀登了上去，找了个站脚处，三刻钟就把这块大石给搬走了。县里的带队干部赞佩地拍拍他的肩说：“好个楞小伙子，真是有股子蛮力气！”

他们俩都是上海市普陀区常德中学的毕业生，一个六七届，一个六八届，小楚比小王高一个年级。楚宝湘这个粮仓工人的女儿，当时是学校毕业生分配小组的成员，学校的原定分配方案是要她进市区工厂的，但她说什么也不肯留在城市里，坚决要求下乡锻炼。一九六九年四月，她和一批男女同学来江西省乐安县金竹公社联村大队窝坑生产队插队，建立了个知识青年集体户，五男三女，王营伟是其中的一个。

金竹公社的所在地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是个方圆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四周群峰环立，层峦叠嶂，一派莽莽苍苍的山势。窝坑生产队就处在这方山丛中一个小小的山坳里，从公社到那儿，得翻越两座山头，走二十五里山路。这山路可难走啦，蜿蜒蜒蜒地在山腰间盘过来旋过去，又陡又窄，崎岖不平。抬头看，群峰耸立，峰顶高踞在云雾之上；朝下望，削壁千仞，山涧中零落地列布着乱石。楚宝湘这伙知识青年刚下来时，汽车只通到乐安县的招携圩，下车后得走四十里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大家开始想，都是些青年人，又都参加过步行串连，四十里路有啥了不起？谁知当天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一问，还有十多里路才能到达呢。路越走越险陡，山崖黑沉沉地象是压到了头顶上，女同学们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哪曾见过这个架势，走着走着就都走不动了。到达目的地后，个个累得筋疲骨软，倒在床上动弹不得。第二天早晨醒来，浑身骨头架子象散了似的，都不想起来了。只



综合场的青年们在学习《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批判邓小平所掀起的右倾翻案风。

量，养起了两只猪、十六只鸡，用来改善集体户的伙食。王营伟帮她们搭猪圈，砌泥墙，每天收工后都坚持从山上砍一担山柴挑回集体户去。一九七〇年初，集体户的青年们都回上海过春节去了，独有王营伟一个人留在山区不走，天天和当地老俵们一起出工。他这个人是闲不住的，一有空就上山砍柴，砍来的柴草足够八个人用上半年，集体户的几亩菜园也都侍候得整整齐齐的。他还学着干木匠、篾匠的活，砍木做条凳，刻竹做水罐、水瓢，学一样，会一样，可真是能干着呢。待到青年们从上海探亲回来时，一看到这副情景，面面相觑，不禁都楞住了。那几个闹着散伙的青年，又是惭愧又是后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想重新提出搞集体户吧，好马不吃回头草，话早说出去了，哪有脸把它收回？楚宝湘是很会处理这种尴尬局面的，她看透了这些调皮鬼们的心意，只当作啥也没看见，沉着而诚恳地说：“大家为什么要分开吃、住呢？我们女青年力气小，砍柴、挑担、挖土都不行，我看还是跟过去一样合伙吧，我们包做饭。”那几个青年心中原已感到自愧，有了下步的台阶，便一个个异口同声地拍胸脯说：“好，合就合吧！再有困难也得大家在一起。”就这样，集体户坚持下来了。

王营伟这个人，在楚宝湘的眼中，别的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刚太烈，这可就有点看不顺眼了。就拿离别上海的那一天来说，当火车缓缓驶离上海站的时候，车厢里许多女同学由于初次离开上海和父母，面对着送别的亲友们，面对着陌生的未来的新生活，禁不住扑簌簌地流下了眼泪。独有王营伟一个人又是笑又是挥手打拍子，一路上反复不停地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下可把许多女青年给惹恼了，她们觉着王营伟的唐突举动是在有意挖苦自己，是瞧不起女青年的表现。再说，大家都是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又何必神气活现地逞什么能？说来也真冤枉，王营伟可没想到有意去得罪和欺负女青年们。这个性格刚强的小伙子天不怕，地不怕，偏是最怕看见别人哭泣；临走时坚决不让他妈妈到车站送行，就为的是妈妈流起泪来他受不了。他在车

有王营伟这个铁汉子象是个没事人似的，一清早就扛着山锄跟当地老俵去出工，收工时还砍了一大捆山柴挑回来。

青年集体户刚建立时比较团结，但日子一长，有人便免不了犯小性子，什么粮食吃多吃少啦，砍柴、挑水、烧饭谁勤谁懒啦，一来二去，有人便提出了要分伙，各吃各的。但王营伟、楚宝湘这几个人是坚持不散伙的。楚宝湘同别的两个女青年一商

上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固然是反映了他对农村的热爱，可也是为了仗这壮着自己的胆呢，车上那么多女青年流着泪，他可实在受不了。女青年们对他这种性格和心情当然是不理解的，只觉得这个人挺讨厌。原来一起约定到窝坑生产队去的八个女青年，有五个为这件事上呕了气，说什么也不愿跟王营伟耽在一个集体户里，还没下车，就坚决要求转到别的生产队去。楚宝湘呢，也觉着王营伟的举动太过份了，不会团结人，有点风头主义的表现。再说，尽管王营伟劳动上过得硬，原则性强，可就是作风有点生硬，又不大爱学习，这也是使她看不顺眼的一个原因。楚宝湘在学校里是红卫兵团的干部，挺能关心人，做起思想工作来既耐心又细心，平时收工回来，一有空就读呀写的，学习抓得可紧呢。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那么大，再加上车厢里的那场误会，因此，刚建立集体户的头一年，两个人谁也不跟谁主动搭腔，一个月说不上几句话。

别看两个人之间寡言少语的，在集体户中倒配合得很不错。楚宝湘做饭，王营伟早就上山把柴打来了，一天也没短缺过柴火。楚宝湘去打水，王营伟抢过担子跑得飞快，把水缸挑得满满的。楚宝湘喂猪养鸡，王营伟在集体户的菜园上没少费了力气，一季就收了近三千斤红薯，猪和鸡的饲料都不用愁了。知识青年下乡头一年的生活供给是基本上由国家保障的。因此，有个别觉悟不高的青年出工不积极，在各个生产队间串门子，找老同学聊天。但王营伟却认为劳动应当靠自觉锻炼，头一年就上山筑路去了，结果由于水土不服，身上长起了一种当地称做大疥疮的脓水疮，一个口子一泡脓水，脓水淌到哪里，皮肉就烂到那里，被逼着送了回来。楚宝湘见了这种情景，打心眼里对王营伟感到佩服，也不嫌他衣服被子上的脓斑脏，主动和另一个女青年抱了去洗，谁知王营伟竟紧皱着眉头给夺了回来，没洗成，两个女青年撅起了嘴，生气了好长一阵子。那会儿，集体户里的男青年翻地、砍柴干活重，女青年们常帮男青年洗衣服，有的男青年图懒，收工后不从山上砍柴担回来，女青年有意见，不给洗衣服了，还死乞白赖地求女青年给帮着洗呢。但王营伟尽管在男青年中干活最重又最累，却总是独个儿在河边洗衣服，从没向女青年开过口，这一回，竟又让两个女青年撞了个厉害的鼻子，可真是有点太不通人情了。但情况后来也就逐步起了变化。楚宝湘见王营伟一天到晚没命地干，干完了生产队的活又忙着干集体户的活，衣服脏得实在不成个样子，又没时间洗，实在忍不住了，就又偷偷地主动帮他给洗掉了。王营伟见了这些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心中着实感动，不好意思也没有勇气再拒绝下去。打这以后，楚宝湘就常常帮王营伟洗衣服了，两个人间的交谈也就开始多了起来。

其实，感情的好坏倒也并不在于说话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俩在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对金竹山区的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立志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革命道路并肩战斗一辈子。有人说，无声的语言往往比有声的语言更能沟通思想，这话在他们的身上倒是说得不假。扎根农村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感情上也越来越接近。王营伟在学校时，好打架出了名，下乡后当上了集体户的班长，出去筑路时也多次被委派为民工的负责人，虽说没再和人打过架，但有时候仍免不了要犯性子。他这个人力气蛮得出奇，干起活来有股狠劲，谁也赛不过他，可犯起性子来，也是谁也不敢惹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楚宝湘做惯了思想工作，很会动脑子，看问题尖锐，分析又深

刻，王营伟这方面比起她来可差得远了。看法有分歧的时候，不管王营伟怎样不服气，经过她的分析和帮助，最后总是服服贴贴地被她说服了。别看楚宝湘这女青年平时挺沉静的，性格可坚强着呢，她才不管王营伟这股又蛮又倔的性子，硬是拿起思想的缰绳来制服这匹桀傲难驯的野马，逼着王营伟看书学习，磨炼他那股火爆性子，始终把马笼口勒得紧紧的。

世上没有桃花源，山坳坳里也并不风平浪静。社会上一刮起什么风，不用多久，便会波及到了这个小小的知识青年集体户。下乡几年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潮，不少人被这股风刮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等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认为坚持在农村的是些没出息的人，只有升大学或调工矿才算是出息，有前途。莫道下山便无难，一山方出一山拦。金竹山区的青年们刚闯过了劳动关、生活关，又遇上了这扎根关，这后一道关口比前几道关更要难闯。那股怀疑和否定上山下乡道路的寒流窜进了金竹山区，在这个小小的集体户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人编造了这样一首口谣：“开门见高山，出门爬大山，一天分值三角三，想想实在勿来山（上海土话，是“不济事”的意思），不如快点溜下山。”这几年来，这个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有的被录取进大学，走了，有的被上调到工矿，走了，这个集体户里留下来的人原本也就不多了。这股拔根风一刮，有的自我门路、投亲插队去了，有的见人少，不是闹分伙就是回上海去了。最后，这个集体户就只剩下三个人了：小王、小楚和另一个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后来调到了别个生产队，于是，这个集体户也就只剩下他们俩这一男一女了。

这可真是个尴尬局面。王营伟这个人还是原来那种什么也不在乎的态度。楚宝湘可心细着呢，又是个女同志，心头总嘀咕着怕会惹来闲言闲语。再说，在这场扎根还是拔根的斗争中，两个人开始时的态度和表现也不完全一样。王营伟是铁定了心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公社两次要推荐、保送他进大学，他不去。矿上来招工的，见了他这副好身材，好气力，思想又好，指名要调他，他也不去。楚宝湘在这时，已被大队党支部选调到了本大队的联村小学当教师。那所小学是由山上的一所旧祠堂改建的，谣传这里常闹鬼，小楚一个人住在里面，当夜就发生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只得提着胆照着手电到处查看。“蓬——”，原来是山风的击门声。“嗯——”，是哼鸟的叹气声。“吱——”，是山老鼠正在窜出屋子呢。闹鬼的原因是给查明了，但一个女仔独身深夜住在祠堂里，也就够难为她的了。她还起早摸黑，备课、改作业、搞家访，把心全放到了贫下中农子女的身上。山村的人，也都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亲人。杀了猪，割块肉腌腊起来留给楚老师。车了塘里的鱼，送几条给楚老师去尝新。那一年过端午节，这家送粽子，那家送粽子，屋里梁上挂了一串又一串。她这个人爱学习，上调工矿倒是从来没想到，就是见了大学来招生，便不免有点儿心动。这一回，上面发下了考生登记表，她不声不响地收下了。暑假里回到集体户，也不出工，整天温习功课。她几次想向王营伟讲明，又觉得没勇气说出口。王营伟也早猜料了几分，整天虎着脸，一早就去出工，晚上很迟收工回来，进门吃了饭后倒头便睡，谁不理睬谁，两个人之间又不说话了。

楚宝湘自小长到大，这样犯愁可还是第一次呢。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向王营伟开了

口,要他一起去读大学。王营伟听了,两道浓眉锁得紧腾腾的,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楞楞地朝她凝视着,似乎她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目光突然变得那么冷淡而严厉。

“你倒是说话呀!”楚宝湘急切地问。

“我来了就不走了!”王营伟闷声闷气地说。

“如果真的在这里一辈子,行吗?”

“有啥不行!”

“那就永远当山里人了呀!”

“山里人有啥不好啦!这里有山有水,贫下中农对我们多亲!”

“看你想的,我才不怕山区的生活艰苦呢!可没成家好办,成了家以后,万一生活维持不下去怎么办?”

“山区的面貌会大变样的。你看,这里林木资源多丰富,山上是宝库,坡地是粮仓,地下是矿藏,全靠着我们去开发它,利用它。这些年来发展慢,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如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新山区一定会很快建设起来的。”

“我原也是这么想,可我爹妈不同意呀!上回我妹妹在这里度暑假回去后,把我俩的情况全对家里说了。我爹妈说啦,在山区锻炼一阵子,可以;生活一辈子,得想一想。这回我想上大学,也是我爹妈的意思。小王,你看叫我怎么办呢?”

“我不走。你要走,你就走吧!我要出工去了。”

王营伟干巴巴地说完了话,拿起山锄和砍刀,径直走出门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楚宝湘站在门口,痴痴地望着山路上那远离去了的背影,又是怨恨又是钦佩,心中象是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咸辣,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看来王营伟是铁着心不走的了,一个人走吧,心中又不愿意。真要说心里话,也实在舍不得离开这金竹山区,就是那个大队也舍不得离开呀,贫下中农待自己可真是比亲闺女还要亲呢。再说,这么大一个村子,祖祖辈辈没有一个有文化的,金竹的小伢子们多爱楚老师哪!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溜走了,能对得起当地的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吗?她左思右想,心头忐忑不定,勉强按捺住心神,坐到桌旁,颤抖着手指打开书本,低下头来,书本上浮现的尽是她教过的可爱的金竹伢子们;抬起头来,屋里是堆得整整齐齐的柴垛,到处可以见到竹制的水罐和水瓢,又不由得想起了她和王营伟这些年来共同走过的这段斗争历程,想起了她自己当年的战斗誓言,不由得自己责问自己:楚宝湘啊楚宝湘,你动摇了?打退堂鼓了?不,我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和党的教导,决不能违背和撕毁自己的红卫兵誓愿。她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越想越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沾湿了书本,最后,她索性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哭吧,哭吧!楚宝湘啊,要与旧传统、旧思想实行彻底的决裂,那确实是很痛苦的。如果眼泪能够帮助你洗涤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灰尘,你就痛痛快快地哭个够吧!人生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呵!

后来的故事怎么样了呢?据当地的老俵们说,每逢上面下来招生、招工的时候,公社干部就见不到他俩的人影。上集体户去找吧,门上拴了把锁,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还有什么故事没有?噢,记起来了。一九七三年八月,金竹公社党委为了把插队在本

地山区的上海知识青年进一步组织起来，改造冷浆田，开发山林资源，办了个知识青年综合场，走亦农亦工的五七道路。公社指调王营伟负责筹建综合场。他冒着烈日酷暑，到处奔走，没日没夜地干活，最后竟把这个铁打的汉子给累倒了，连续三天发高烧，体温高达摄氏40度，昏迷得人事不知。楚宝湘得知后，焦急地赶来了，碰巧请到了路过的矿上医生来治疗，整夜守在床边，眼睫毛没上下沾过一下。天亮时，王营伟醒过来了，起了床就喊肚子饿，一口气喝了两大碗粥，就又赶到综合场去搞筹建工作去了。联村大队的老大娘们对王营伟又是疼惜又是气恼，都在背后埋怨他说：“这崽真是个蛮性子，好女仔在床边守了一整夜，眼睛哭得核桃样肿，他一醒过来，二话没说就又走了，真是个没情没义的东西！”

这就是王营伟和楚宝湘这两个青年人的一小段没头没尾的恋爱史。但这又能算是什么恋爱史呢？不，应当说是关于他们俩的一段扎根史，一段斗争史。

## 二、婚礼进行中的故事

婚礼在继续进行。

会上，抚州地区革委会徐副主任表示祝贺，地区知青办许主任、乐安县委书记、贫下中农代表杨贵才以及其他人都相继讲了话。大家热情地祝贺了这场新事新办的婚礼，指出了上海知识青年在当年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里结婚、安家，体现了他们扎根山区、铁心务农的坚定意志，是对革命前辈光荣传统的继承，是向旧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也是对邓小平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以及种种奇谈怪论的批判。大家还在发言中诚恳而中肯地指出，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结婚仅仅是扎根的开始，而不是扎根的结束。无论是上海青年和上海青年结婚的，或者是上海青年和当地青年结婚的，在婚后都不能去忙着建设小家庭，应当艰苦奋斗学大寨，共同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山村作出新的贡献。

长辈们的谆谆告诫，温暖着青年们的心，他们浑身都觉得暖融融的，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会场内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感染着到会的每一个人。

当主持婚礼的老谢宣布赠送新婚夫妇礼物时，会场上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在喧闹而欢乐的锣鼓声中，公社党委书记老黄向新婚夫妇们赠送着竹斗笠、竹扁担和竹柄的山锄，斗笠上写着“扎根山区学大寨”的红字；二十个红小兵在劈劈拍拍的鞭炮声中一拥而上，十个男孩和十个女孩分别向新婚夫妻们献上了大红花，大红花下飘垂着写有“一代新人”字样的纸签。家长代表也分别向青年们赠送了礼物。楚宝湘的父亲楚伯伯送的是两盆扎根树，朱年妹的母亲朱妈妈送的是一束良种高粱穗。他们期望着自己的女儿和其他青年人一起，深深扎根在金竹山区的肥沃土壤中，就象山上那些挺拔而青翠的竹子一样，经得住风雪冰霜的严峻考验，郁郁葱葱地迅速成长起来。桌上，成堆成堆地放着花生、瓜子和红薯干，都是青年们用自己的双手收获的劳动果实。大家喝着茶水，剥着花生，磕着瓜子，嚼着红薯干，兴高采烈地准备观看乐安县文工团演出的名叫《扎根峻岭建新家》的歌舞。

县文工团载歌载舞的演出，轰动了整个山村。但当时使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青年们自己在会上演出的节目。朱志来和杨小玉这对新婚的青年人，此刻就正在婚礼的会上表

插队山乡来落户，  
重走当年红军路。  
啊，好高的山，  
好深的谷！  
山路似飘带，  
缠着云絮裹着雾……

听着这琅琅的诗歌声，  
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关于他们  
俩的一段故事。

朱志来个子比王营伟  
高，肩也更宽些，长得魁梧而

结实。论起干力气活，除了王营伟，青年中很少有比得上他的。他下乡以来，从没要家中寄过一分钱，每年扣除了口粮，总还得分上百把元的。杨小玉的父亲是个党员，对她要求严，每次来信总是教育她要热爱农村，扎根农村。这两个人原先不在一个生产队，一九七四年间先后进了金竹公社的知识青年综合场，才开始相识。

那时候，正是综合场的创业时期，可艰苦啦。综合场除了种地以外，还有个制作油布伞和车刷柄的小作坊，为了保证原料的供应，得上山去砍毛竹。七月头上进的山，正逢上大暑天，日头晒得毒辣辣的，山高坡陡，竹子密密层层长在斜坡上，连站脚都没个地方，砍竹时用力过了头，连人带砍刀都得往坡下滚，到了晚上，山蚊子有半寸长，一叮就肿一大块。女青年们拖砍下来的毛竹，少说也有百把斤重，上坡时真够累的。朱志来力气大，肯帮助人，见到杨小玉或其他女青年拖不动毛竹时，常撂了手头活来帮助。朱志来得了痢疾，瞒着人不讲，照样坚持在山上砍伐和搬运毛竹。后来病重了，被逼着送下了山。他趁人不注意，从公社卫生院里溜了出来，拄着竹棍又上了山。杨小玉见他劳动好，又关心集体，就和他有了感情。下山后过了半年多，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他俩就合在一块儿吃饭了，还搞了个小炭炉子，平时吃食堂，有时也自己煮点豆或下面条，反正山里有的是炭。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但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原来朱志来自小爱读《三国》、《水浒》，受了书中错误观点的影响，遇事好讲情面，原则性不太强，又爱讲江湖义气，三朋四友在一起，就打扑克，乱聊天。杨小玉看不惯，就常要批评他，不准他打扑克，说起话来又尖又辣，一点情面也不留。朱志来是个服软不服硬的性子，挨了小杨的批评，觉着脸上无光了，就瞪眼发脾气，摔碗打盆的闹过两回。杨小玉个性强，又好胜，针尖对麦芒，才不理睬他这一套呢。再说，明见得是朱志来理亏，还凶呢，凶个屁！这一来可热闹了，两人间常少不了争吵，一句来一句去的，刀枪叮当，谁也不让谁。话还得说回来，朱志来是个铁嘴豆腐脚，理上又站不住，常是闹着闹着就软下来了。杨小



青年们在婚礼后，就去修筑大寨田。背景是新婚青年居住的扎根房。

玉见他认错了，心就软下来了，两人就又和好了。但他俩从此在综合场里也就出了名了。旁人都说他俩的感情是闹出来的，好了又闹，闹了又好，越闹越好。

有一回，两个人的关系可真的是闹僵了。朱志来这个人有点私心，综合场里削伞骨定时定量计报酬，定额五十把，他一天常削一百来把，天天超额。后来派他去种桉树，没定额，他懒懒散散的，一天没移栽了几棵。小杨知道了，就说他：“你跟弯弯绕一样了！”朱志来听了，想跳脚吧又没理，心中窝着火，忍住了。隔了没几天，朱志来去南坑为综合场买石灰，挑回时天已黑了，心想回家后准能吃上顿好的，谁知一揭开锅，锅里是红薯。他不爱吃红薯，就呕着气回屋倒头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越想越呕气，借口杨小玉没去打早饭，使起性子来了，还摔破了一个碗。其实杨小玉倒不是不关心他，只是拿不准时间，想等他到家后再做饭，怕他饿着，先煮锅红薯搁在炭炉子上。她也是个好胜要强的性子，哪里是个能让人的，见朱志来一闹，也就火了，便数落他：“忘了本了，连红薯也不想吃了！”朱志来气得打叠起了被子，闹着说要回生产队去，杨小玉气鼓鼓的也不理他。闹了好长一阵子，两人都觉得有点后悔了，想转圜吧，谁也不愿先开这个口。碰巧这时王营伟来了，便做朱志来的思想工作：“别嫌这里山高、水冷，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我们这个综合场，就建立在当年红军制药厂的旧址上。我们应当继承红军的传统，沿着革命前辈走过的道路走下去。你老是只想着自己占便宜，都象你这样，能行吗？”朱志来素来佩服王营伟，就认了输。他和杨小玉俩吃了顿和合面，面条是王营伟给煮的，吃完了和合面，两人也就重又和好了。

最近一年来，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少多了，原因是朱志来去年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后，提高了觉悟，克服了私心。他还主动提出了劳动不应当计较报酬的倡议，要求取消削伞骨超过定额可以多预支生活费的旧规定。杨小玉呢，说话上也比先前有改进，比较能注意方式、方法了。你听，他俩正在通过诗朗诵来表达着自己的愿望和感情呢——

金竹山上红旗舞，  
一代新人播征鼓；  
沿着长征道，  
再走两万五。

……

笑声、掌声、诗歌朗诵声、鞭炮声和锣鼓声，汇聚成了一片。这可真是场热闹而欢乐的婚礼啊！

但是，此时此地，也并非不是每个人都怀着欢乐的心情。阙华竹就在那里楞楞地坐着，心中正犯着愁呢！

她为什么要犯愁呢？

信，信，妈妈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来信了，看来妈妈对这次婚礼是反对到底的了。

小阙在家里排行第二，兄弟姐妹中数她最受她妈妈的疼爱。一九六九年，小阙来江西插队落户，临走前，她妈妈千叮嘱，万叮嘱，叮嘱她千万不能在农村结婚，结了婚，上调的机

会就少了。她来金竹公社后，分配在半坪大队，她妈妈又一再来信叮嘱，在农村好好锻炼，表现要好，争取早日上调，千万不能瞎七搭八的，朋友可以谈，但不要结婚。

小阙在半坪大队劳动了三年后，对王学民发生了感情。王学民是流舍大队下乡知识青年的排长，劳动好，要求自己严，能认真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小阙怎敢将这件事告诉妈妈呢？山区生活艰苦，她从来不跟家里说，更不用提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了。后来，王学民被调到了矿上当工人，小阙被大队党支部调去当小学教师，小阙回上海探亲时，才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妈妈。她妈妈一听，急了，说是里弄中有许多青年在农村，有的三十多岁了，没有结婚，一个个都调上来了，有的二十四五岁，结了婚，调上来的机会就少得多了。再说，你当上了小学教师，经济上虽可以过得去，但一个女孩子，离家这么远，又是一个人，娘想到这里就要流眼泪，无论如何不能在江西结婚，结了婚就别想上大学了，要想办法调回上海来，娘帮你在上海找个朋友。

但是，小阙左思右想，斗争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决定回到山村来了。王学民到矿上后，想争取将小阙调到矿区附近当家属工，小阙可不愿意啦！她说，这里贫下中农有多亲，我是不愿离金竹山区的，要不，你就回来务农。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小阙调到了公社的知识青年综合场，决定和王学民结婚了。但她妈妈还是坚决不同意，说是结了婚，就再也不要阙华竹上门了。小阙写了封信给她妈妈，再三说明扎根农村的道路是正确的，说是如果同意，希望赶快回信，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回信了。但她妈妈就硬是不给她回信。小阙这回可真犯愁了，但她看到综合场中有个女青年叫周佩丽的，为了在农村成家，也曾经碰到了不少阻力，但她说什么也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她就又写了封信给妈妈，说是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她这个婚是结定了。如果妈妈不认我这个女儿，那也就算了，从此就不回家了。

话虽是这么说，但小阙是多么希望妈妈能来信呀！因此，在婚礼的会上，当新婚青年的家长代表俞方卿祝贺自己新婚的女儿扎根山村的时候，勉励着青年们要同贫下中农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时候，泪珠禁不住在小阙的眼角里滚转着。妈妈呀妈妈，你怎么这样顽固？你倒是来这里看一看，别的青年的家长是多么热情地支持自己的子女扎根农村闹革命呀！

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在汹涌澎湃地前进着，到处可以遇到暗礁和险滩，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阶级敌人的破坏，也有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思想的障碍。但滔滔前进着的革命洪流决不会因此而在途中有半刻的滞留，而是迅速地把所遇到的暗礁和险滩抛留在身后面。小阙，朝前看，前进吧！

### 三、关于青年综合场的故事

在这场婚礼中的新婚夫妇们，大多数人是在金竹公社的知识青年综合场参加劳动的。他们积极地献身于建场的战斗，并随着青年综合场的成长而成长，无论是在生活上和感情上，都紧紧地与青年综合场的事业相连在一起。

这个综合场目前共有五十一人，其中上海知识青年四十二人，当地贫下中农七人，从上海请来的作技术指导的工人师傅二人。他们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得到了贫下中农的教育和帮助，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在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建成了一座亦农亦工、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综合场。

读者不知看过《赣南纪行》没有？那里曾经介绍了乐安县有个金竹公社青年队，还提到了有十对青年正在谈恋爱或准备结婚。这个金竹公社青年队，就是金竹公社知识青年综合场的前身。但当时叙述的是一九七五年四月间的情景，建场才只一年，现在的规模可大得多了，知识青年们也陆陆续续开始成家立户了。这婚礼的举行，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综合场今天的规模吧！

金竹公社位处乐安县境的最南端，海拔平均一千二百公尺，山高水冷，无霜期短，双季稻不稳收，亩产低。但综合场的青年们却于一九七五年在高山梯田上试种双季稻获得成功，亩产八百六十五斤，超过了“纲要”，是全公社中最高的。单季稻的亩产也从一九七四年的三百二十斤跃到了一九七五年的五百八十斤。此外，综合场在山坡上试种了十亩桔子树，塘里放养了六百多尾鱼，圈里还存养着九头肥头大耳滚圆可爱的肉猪呢！

在山麓下，面对着梯田，是综合场的竹木加工场，车间里有车床四台，木车床四台，柴油机四台，固定资产达四万六千多元。这个加工场的主要产品是油布伞的成品和半成品，从上山砍伐竹木起，包括劈竹、削伞骨到成品出厂的全部工序，全都由综合场的青年自己完成。这个加工场的全年产值，在一九七四年是二万二千元，一九七五年是五万三千元。同时，这个综合场还附属有发电站、碾米加工厂和农机修理站。过去，附近生产队的农机坏了一个螺丝，也得走一百八十里路到乐安县城去修理。现在农机出了小毛病，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随修，那就方便得多了。

综合场的青年集体宿舍是一幢上下两层共有二十多间的大楼房。这一年来，又造了六百平方米的平房作为家属宿舍，新婚夫妇们每对都分到了一套两间三十五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金竹公社党委对知识青年们的关怀可真是无微不至啦！

如同青年们各人有着自己的不同的曲折经历一样，知识青年综合场自身也有着它自己的发展史。它走过了一条艰苦创业的道路，今后也仍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这个在今天已达到了半机械化程度的综合场，当年是全依仗着十四个人、十把篾刀起家的。一九七四年四月建场时，什么也没有，就是这十四个人。他们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搞来了十把砍竹的篾刀，拿不到篾刀的，就用柴刀代替，十男四女，兵分两路，背着米，挑着锅，四月五日上了山。没菜吃，就吃带上山去的萝卜干；没住的，找了间四面透光的破木屋，搞点树皮盖个顶。日砍夜削，二十三天砍了六十根毛竹，削了两万块车刷柄，又碰上了梅雨季节。在那些新婚夫妇中不是有个叫王韵洁的女青年吗？别看她身材瘦瘦小小，长得挺秀气，身子骨子可硬着呢！那时节，她为了要抢挑竹子下山来，体重才八十一斤，硬是挑起了一百二十斤的担子，走两步，停一停，拐了脚脖，咬着牙再走。老贫农张春生见了心疼，说：“小女仔，还嫩着呢，不要挑这么多呀！”可小王说：“不

行，竹子一百段一担，分二担走太慢了，时间那么紧，梅雨不等人，抢挑竹子要紧！”就这样，最后还是没来得及把砍下的竹子全部挑下山，留在山上还有一千六百根竹子，都霉烂掉了。在山下削伞骨，又碰上梅雨天，削了发霉，做了没用，有人就要闹散伙，人心浮动。但王营伟、王韵洁、朱志来、杨小玉这些青年人都很坚决，在墙上刷出了标语：“中国人死都不



青年们在挑竹子下山

怕，还怕困难吗？”“贫下中农祖祖辈辈在这里创业，我们还不行吗？”他们为了积累资金，筹建综合场，就去挖黄泥、拉沙子，没板车，问别人借，经常干到晚上八、九点钟。几个男的气力大，就去搬石头，当临时工。两个月下来，扣除生活费用，积累了五十元钱，这就是综合场的第一笔建场资金了。七月二日，天放晴了，第二次又上了山，二十二个人。这一回可艰苦了，大伏天里，劳动可累啦，再说，就连萝卜干也吃不上，喝点酱油汤、盐水汤就算是菜了，不多天下来，拉痢的也有，打摆子也有，身上长起了大疥疮的也有，可男男女女就是没有一个人主动要求下山治疗的。原来有的人对办青年场、队没信心，说是小青年吃不了苦，迟早得散伙，是瞎胡闹。这一回砍竹下山后，舆论可大变了，说是这些上海人真是能吃苦，有干劲！

竹木加工场建立起来后，原料赶不上供应了，第三次又上了山，在山上过的国庆节。这一九七四年的三次上山，保证了原料的供应，积累了资金，还锻炼了人，对综合场的贡献可大啦。铁要锻打才能成钢，综合场的青年们也正是在这样的严峻的考验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这一年，他们削了十万根伞骨，六万块车刷柄，县土产公司帮他们联系，同上海青浦县的一个油布伞厂签订了合同，综合场就此站稳了脚跟。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到了年终分配时，矛盾可尖锐啦！一部分青年强调多分，说是一年苦下来了，该让大家日子过得舒坦点；但大多数人反对这种做法，说是西瓜没熟就先吃瓢，都分光了，还办什么场！再说，分多了，跟当地的贫下中农收入上的差距也就大了，不能这么做。因此，应当多留积累，扩大再生产，明年可以多吸收点知识青年参加。双方拍桌打凳闹得不可开交，那些正在谈恋爱或准备结婚的男女青年，十对中就闹翻了三对。男的说：“多分点，准备成家嘛！”女的说：“我不希罕，你想把综合场都分光了，我不同意！”男的说：“明年综合场要增添新人，多留了，不就便宜了他们了？”女的说：“你就那么自私？损人利己的东西，谁跟你好就倒了霉了。”后来，在公社党委主持下，全场停产辩论了三天，讨论究竟是要“钱”还是要“线”？那些闹多分的青年在提高了认识后，

承认了错误，说是不该眼中只看到钱而丢掉了路线，这样搞下去，既毁了综合场，也毁了自己。这场斗争可比跟艰苦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要严峻得多啦，但也正是经过了这场斗争，综合场在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引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才有今天的蓬蓬勃勃的发展。

当然，对于综合场来说，今后仍然是继续会有斗争的。但只要他们牢牢记住历史的教训，永远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综合场的事业是会兴旺发达起来的。

——这就是关于青年综合场的故事。

我们了解了青年综合场的创业史，深受感动，很想亲眼去看一下当年知识青年在那里战斗过的地方。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探访塘湾洲伐竹场了。

塘湾洲在金竹公社的西南，峰高峦险，走去大约有二十多里山路。我们起了个早，天蒙蒙亮就出发了，沿着盆地的边缘，顺着从山脚下开始的盘坡小道，吃力地攀登上了盆地东南面约一、二百公尺高的山崖，然后折向西南，进入了万山丛中。阴沉沉的天空，肃杀而酷冷，满坡遍野是暗褐或枯黄色的杂树、荆棘和荒草，大多数树木只剩下了树干和丫枝在寒风中颤抖着，只有强劲的松柏不畏凛冽的寒风，傲然屹立于山崖间。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山势越形险峻，左边是悬崖深沟，右边是陡立的削壁。那路才真叫窄呢，如果对面来了个人，就得侧着身子贴着山崖，才能给对面的来人让道。

过了这段险路，便进入了林区。

这里的景色别是一番宏伟的气象，周围大多是高大的枝叶不凋的常绿乔木，其间还夹杂着成片成片的竹子。笔直而挺拔的红杉和云杉，高大的合抱粗的株树，在严寒中绽吐出嫩绿色新芽的乌柳，还有枫树、椴树、桐树、漆树、雀柳以及其他许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各种各样的树木。

“这可真是个好狩猎的好地方呢！”陪行的公社党委副书记老杨向我们介绍：“在这里，鹿、狼、狐狸、豺狗、老虎、野猪什么都有，山老鼠比猫还要大。不过，伏天里上山，得提防高山楂和青竹蛇。高山楂只有尺把长，土灰色，常盘在树干上。青竹蛇又叫竹叶青，跟竹子一个颜色，弓着身子跳起来，能咬住人的脖子。这两种都是很毒很毒的毒蛇，被咬上一口，不用多久时间，便没法治了。但这也沒什麼可怕的，王营伟刚下乡时，床头的瓶瓶罐罐里就专爱放养这些长虫百脚的，说是好玩着呢！”

说说谈谈，又走了不少路。我们心里老是在惦念着：这里既然叫金竹山区，总该有种黄澄澄的竹子吧！动了这个好奇的念头，沿途就一直在留心地观察着各类的竹子。这里的竹子种类真是不少，有毛竹、淡竹、篾竹、杂竹等等，噢，还有名贵的桂竹和紫竹呢。这些劲直的竹子，有的碗口粗，有的才茶杯口大，也有只是小指头那么粗细的。虽说眼下正在腊月里，但大多数的竹子笔直地挺立在寒风里，仍然显得那么青翠可爱，也有青里泛黄的，但就是没找到黄澄澄颜色的金竹。

“噢，这里怎么没看到有金竹呢？”我们中的一个问。同行的老邓听了，呵呵地笑着，他约摸四十七、八岁，也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老邓和公社的黄书记一起，为综合场的创办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他边走边说：“前面就是塘湾洲了，到那儿坐下再说吧！”

山路越来越陡，一直往峰顶上伸去，到了峰腰深处，路突然断了，塘湾洲到了。

这是个小小的山坳，三面靠山，北面有条山溪，淙淙的流水由西向东流去。这个小山村共有四户人家，村中心耸立一棵高大的柏树，有二十多公尺高，虽在大寒天里，仍然长得郁郁葱葱。老邓把我们领到了村北的一户社员家里，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面条，好客的夫妇还给我们煮了红薯，炒了南瓜子。这时，一位乡办干部给我们说了金竹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原是一片荒凉的山区，杂树、荒草有的是，可就是没有竹子。后来有对男女青年，受不了官府的压迫和地主的剥削，逃到这个渺无人烟的山里来了，在山里结了婚、安了家。有一年，那个男的翻山到了永丰县的南坑，从那里带回了一棵小野竹，栽在门前的山坡上，竹子拔节后，竹鞭上绽出了竹笋，慢慢就出现了竹林。夫妻俩吃的是竹笋，用的是竹子制成的器物，觉得这竹子挺金贵的，就叫它金竹。年复一年，这小片的竹子沿着山坡蔓延开了，成了大片大片的竹林。夫妻俩死了，儿孙们继续开垦着山区。据说，这漫山遍野的竹子，都是这棵小野竹的后代。生长在这里的山民们，都是这夫妻俩的后代。金竹的名称也就这样沿用下来了，这就是金竹山区的来历。”

“可有一点，”老邓接过老熊的话说了下去：“我看这夫妻俩比今天的知识青年们可差远了。他们俩图的是个人的成家立业，而我们青年今天的艰苦奋斗，为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艰苦创业可也有两条道路，眼下不少青年结了婚了，究竟是光图个人小家庭呢还是考虑集体的事业，考验可严峻着呢！再说，思想上说啥也不能忘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路线不对头，再艰苦创业也没用！”

饭后，略歇息了片刻。在正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山巅。天气已开始由阴转晴，阳光驱散了山雾阴霾，照得我们身上暖洋洋的，连山风的凛冽刺骨也都不觉得了。往山下望去，坡上便是青年们的伐竹场，这片竹林不大，大约有二三十亩，依稀尚可辨认出当年砍伐过的痕迹。老邓对我们介绍说，砍了竹子，只要竹鞭在地下残留着，就又会长出竹笋来，不消几年时间，就可以重新形成一片茂密的竹林。这里的森林资源可丰富呢，全公社只有一千四百多户社员，山林面积却有近十四万亩，还有一万六千多亩成片的竹林，知识青年在这里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呢。

我们站在这海拔一千七百多公尺的山巅上，极目远眺，四周一片崇山峻岭，峰奇崖险，叠叠重重，远处的许多山峰都隐藏在云雾里。朝西面和北面看，是一片由各种树木组成的茫茫林海。转过头来，东北方向，是一片茂密的原始竹林，连绵不绝，无边无际地往前延伸开去，一眼望不到边。这可真是竹子的海洋啊！

太阳在空中当头照耀着。金色的阳光照在这无边无际的竹子的海洋上，金灿灿，黄澄澄，寒风呼啸着吹过，这海洋便层层掀起了金色的怒涛狂波。我们望着这壮丽的奇景，屏息着呼吸，一种浑厚、肃穆的感觉笼罩着全身。

挺拔而劲直的竹子呵，你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化身！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成片成片的金竹必将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地茁壮成长！

#### 四、尾声——故事以外的故事

婚礼举行过了，祝贺的客人都走了，故事也该结束了。

不，还有我们自己的故事呢！

我们几个青年人在回上海后，一边整理着笔记，一边老惦念着阙华竹的命运，听说她也回上海探亲来了，不知道她妈妈究竟会怎样对待她？

“走，到她妈妈的家里去！那么死顽固，得开导开导她！”这是宣玲玲，一向心直口快，就是有点儿莽撞。

“这样做法好不好？会不会太冒失了！”陆晓禾有点犹豫，她比较谨慎。

“没关系，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嘛！”周勇闯洋洋自得、很有把握地说。

我们三人翻阅着笔记本，查到了阙华竹家的地址，就在当天夜晚雄赳赳地上阙家去了。

敲开了阙家的门，阙妈妈问清找谁后，高高兴兴地把我们迎了进去，向屋子里喊道：“华竹，有客人来找你了。”

屋子里出来的是阙华竹和王学民夫妻俩。阙华竹一看是我们，就赶忙招呼我们坐下，边给我们倒茶，边对我们说：妈妈待他们俩可好呢，做了中班回来，还给王学民洗衣服，这可是他家的兄弟姊妹中谁也没享受过的待遇呢。阙妈妈听着阙华竹絮絮不绝的话语，笑咪咪地望着我们，就象是早已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似的。

我们知道这一回有点冒失了，每人接过了阙妈妈递过的一包喜糖，道贺了几句，就赶紧告辞出了门。

到了阙家的门外，见马路上没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觉得有点尴尬。

忽然，不知是谁放声笑了起来，别的人也跟着一齐哈哈笑了起来。笑声在空旷的马路上海回荡着。这究竟是在为阙华竹感到高兴呢，还是在为自己的鲁莽举动感到好笑，这就只有请读者们自己去作判断了。

是啊，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并不仅仅照亮着金竹山区，而是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全世界。知识青年们在前进，知识青年们的家长也在前进，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的道路上前进着。

前进吧，中国的青年们！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稿，七月修改定稿。

(本文照片由上海电视台供稿。摄影：朱黔生)



一 九 七 六 年

第 九 期

总 第 三 十 七 期

---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

代号: 4-192

定价: 0.25元